

淨土接紅塵

——清代廣州海幢寺的經僧群體、刻書事業與社會網絡^{*}

楊 文 信^{**}

摘 要

從十八世紀中期到十九世紀末葉，海幢寺不僅為廣州及鄰近地區的民眾所熟悉，也是最為西方人所知的中國佛寺。這除了因為歷史悠久，作為遊覽勝地、文化和外交活動場所，還因為該寺刊刻佛教文獻。這些文獻既滿足僧侶和世俗的需要，還流傳域外促進中外交流。不過這樣重要的一所佛寺，它自十八世紀中期起的中段歷史卻處於若存若亡之間。要重建這段鮮為人知的歷史，首要工作是整理現存的「海幢文獻」。這批文獻為了解參與刻書事業的寺僧事蹟、其佛學思想和寺院的歷史提供重要資訊。本文建基於筆者對海幢文獻的實地調查，全文分為七節。引言扼要說明個人對重建海幢寺史的新構想，第二節對現存海幢文獻的特點與價值作綜合考察。第三至五節透過利用海幢文獻與一手中西史料，考察該寺經僧群體的形成與發展、分析刻書事業與清代文網的關係、說明不同背景的捐助社群如何參與文獻的刊刻流通。第六節轉為探究海幢文獻和寺僧在中西交流上的角色。結語重申研究海幢寺史對了解清代的宗教與政治、廣東佛教和中西關係史的重要意義。

2021年3月31日收稿，2021年11月23日修訂完成，2022年1月22日通過刊登。

* 本文獲香港研究資助局（Research Grants Council）撥款進行題為「宗教、文獻、娛樂、外交：十九世紀中西關係中廣州海幢寺的角色」研究專案（編號：27606817）的成果之一，香港大學中文學院「Small Research Grant」亦提供資助，特此一併致謝。

** 作者係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助理教授。

關鍵詞：中西關係、廣東佛教、海幢文獻、經僧、禁燬書

一、引言：重建海幢寺歷史的新構想

廣州海幢寺是第一次鴉片戰爭（1839-1842）以前個別獲清政府認可對西方人開放的遊覽場所，也是西方人最熟悉的中國佛寺；即使在五口通商以後，它在中外交往的歷史上仍然占據重要角色。海幢寺在旅遊、文學、外交和宗教各方面發揮的多元功能，近年引起了中外學者的關注。¹然而，對這樣重要的一所佛寺，國際學術界對它以僧侶、佛教文獻為主體的歷史，所知卻有限。本文之作，與過去以外銷畫冊、文學活動、寺院建築與設施等為主題的研究不同，是利用「海幢文獻」重建以經僧群體、刻書事業為中心的海幢寺歷史。²這段歷史不僅涉及該寺僧侶，也與區內外的佛門同道、來自各種社會背景的助刻善信有種種聯繫。現代「印刷文化」（print culture）概念所包含的印刷品（print artifacts）及其社會歷程（social processes of print）這兩個組成部分，都是本文探討的重點。³

海幢寺所刊刻及流通的典籍，筆者稱為海幢文獻。學界一般認為這些文獻包括：（1）由該寺梓刻，及（2）翻刻自藏於該寺的刻板（刻板可來自它處），即「海幢經坊藏板」或「板藏海幢寺」者。⁴筆者認為尚可以補上一類：欠板刻資訊但明確屬於寺僧的著作，包括講經說法紀錄、語錄和其他作品，如《海幢阿字無禪師語錄》、《海幢朗如大師語錄》（以下簡

1 王元林、陳芸，〈清代中後期廣州海幢寺的對外開放與中外宗教文化交流〉，《世界宗教文化》2018.6(2018.12): 40-45；張龍平，〈清代中後期來華西方人的海幢寺印象與宗教文化觀念〉，《澳門研究》89(2018.6): 70-82；嚴旋萍、吳天躍，〈收藏、翻譯與藝術趣味：西班牙人阿格特與清代海幢寺外銷組畫〉，《文藝研究》2020.9(2020.9): 146-160 等。

2 楊文信，〈蒼萃中西·多元功能——論重構清朝中後期海幢寺歷史的起點〉，收入釋新成、釋光秀主編，《海外文獻與海幢寺文化研究》（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8），頁 174-180。

3 Philip Clart and Gregory Adam Scott, introduction to *Religious Publishing and Print Culture in Modern China: 1800-2012*, ed. Philip Clart and Gregory Adam Scott (Berlin: De Gruyter, 2015), 2.

4 張淑瓊，〈清代廣州海幢寺經坊刻書及藏版述略〉，《嶺南文史》2012.2(2012.6): 53-54，該文再引均簡稱為〈藏版述略〉。

稱《朗如語錄》)、《比丘戒本疏義》等。⁵ 補上這一類著作，可以更全面地了解海幢寺的整體歷史，尤其是以經僧為本位、結合該寺推動佛教文獻的刊刻和流通的事業。

自從《馬禮遜藏書書目》(以下簡稱《書目》)面世，占馬禮遜(Robert Morrison, 1782-1834)藏書中漢文佛教典籍主體的海幢文獻逐漸受到國際學術界注意。⁶ 有關海幢文獻的域外流布與收藏，近年中國大陸學界最為關心，從中西文化交流、文獻學、域外漢學及漢籍的傳布等方面進行調查和介紹。其中，張淑瓊以《書目》所載為基礎，整理出包括其他館藏的海幢寺刻書 44 種、板藏書 82 種(總數並非簡單地相加為 126 種，參下文)；謝輝介紹了巴伐利亞州立圖書館(Bavarian State Library, 以下簡稱巴圖)所藏的 28 種，陳恒新、王域鉞分別查出法國國家圖書館(以下簡稱法圖)所藏 50 餘種及 70 餘種。⁷ 越南、泰國華僑和寺院之翻刻海幢文獻，櫻井由躬雄、大西和彥早加注意，最近有王小盾等的研究。⁸ 以上這些論著，增進了我們對海外海幢文獻的認識。當然，也有研究者從不同學術範疇出發，對這些文獻進行特定主題的考察。但是直到目前為止，幾乎沒有人嘗試系統地以這批文獻提供的史料來重建該寺的歷史。從重建寺史而言，我

5 參本文後附「海幢文獻知見錄」，徵引時均附表中編號。上引三書的編號分別為〔102〕、〔35〕及〔23〕。

6 Andrew C. West, introduction to *Catalogue of the Morrison Collection of Chinese Books* (London: 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 1998), xix.

7 張淑瓊，〈藏版述略〉：52-55；謝輝，〈德國巴伐利亞州立圖書館藏清代海幢寺刻經述略〉，《國際漢學》11(2017.6)：177-182，下文再引均簡稱為〈刻經述略〉；陳恒新，「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漢籍研究」(濟南：山東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博士學位論文，2018)，頁 29。王域鉞，「法國國家圖書館古恒《中文、朝鮮文、日文等書籍目錄》及著錄漢籍研究」(濟南：山東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博士學位論文，2020)，頁 119，但頁 142 指所藏約為 60 種。

8 (日)櫻井由躬雄，〈在泰京越南寺院景福寺所藏漢籍字喃本目錄〉，《東南アジア—歴史と文化—》8(1979.4)：86-114；(日)大西和彥，〈近世ベトナム佛教界と廣州海幢寺〉，《佛教史學研究》27.2(1985.3)：69-94；王小盾、王皓、黃嶺、任子田，〈從越南的四所寺院看漢籍在域外的生存〉，《域外漢籍研究集刊》18(2019.6)：421-442。

們不能滿足於對個別地區或館藏的認識，而需要收集更全面的史料和資訊，進行更詳細的分析和整合，結合海幢文獻和經僧為主要研究對象。

之所以考察經僧，是因為海幢文獻的編著、刊刻、收藏與流通是寺中不少僧侶參與的事業，而這個事業幾乎與清代（1644-1912）相終始。今釋（金堡，1614-1680）有言：「佛法之寄，重在於僧；海幢之重，以阿字大師（今無，1633-1681）」，⁹ 這說明僧侶在傳揚佛法、建設寺院的重要作用。過往對海幢寺僧侶的論述以詩僧為主要對象。¹⁰ 文學創作無疑是僧侶與官紳文士交往的重要活動，不過傳揚佛法是寺院更重要的使命。長於佛理、參與寺務者未必都精於詩道。本文所言經僧，不僅指參與校刻佛經者。從海幢文獻的牌記、捐資名錄和序跋等，可見經僧的貢獻包括編撰佛學論著、輯錄前人語錄及詩文、搜羅刻板、校刻文字、撰寫序跋、為刻板書字、捐資刊刻或助刻、連繫捐助者等。海幢文獻的刊、藏和流通事業跟其他文化活動相同，都有助加強寺院跟不同社群的聯繫，而經僧的生平點滴，就靠這項事業來鉤勒。串連起這些史料，可以呈現海幢寺少為人注意但深具意義的歷史面貌。

最後，研究以僧侶、文獻為中心的海幢寺史，有助思考三個相關學術範疇的問題：（1）宗教與政治。該寺刊刻、流通的文獻，與清朝的文化、思想統制政策有何關係？（2）廣東佛教史。考察經僧群體的成長、佛教文獻的流通事業，如何能增進對區內佛教史的認識？（3）中西關係。了解海幢文獻的特點、僧侶的活動，怎樣有助理解該寺在中西交流中發揮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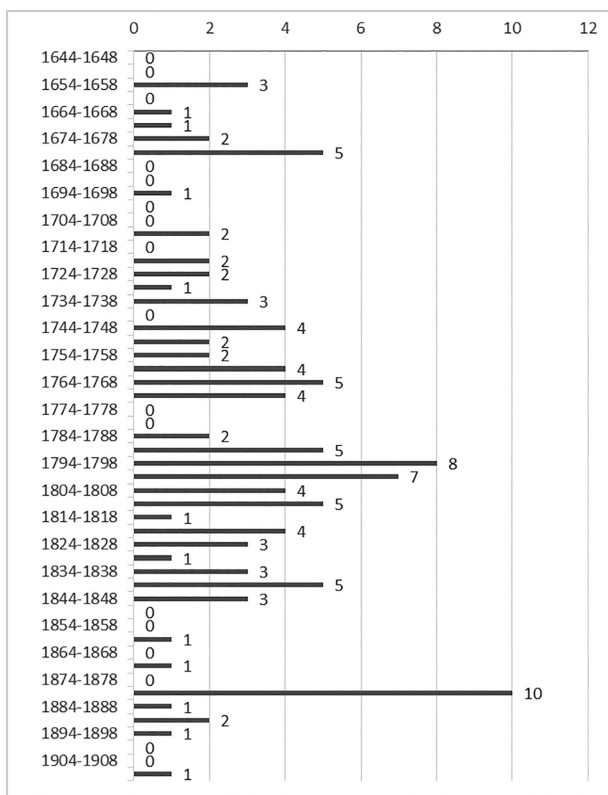
9 清·釋今釋著，釋古理、釋古習編，《徧行堂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46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卷 9〈海幢寺募建大雄寶殿疏〉，頁 442。

10 李舜臣，《嶺外別傳：清初嶺南詩僧群研究》（廣州：南方日報出版社，2017）；王美偉，「明末清初嶺南士僧交遊與文學」（重慶：西南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郭林林，〈海幢寺與清代廣州文人文化活動研究〉，《嶺南文史》2020.1(2020.3): 21-28；楊文信，〈薈萃中西·多元功能——論重構清朝中後期海幢寺歷史的起點〉，頁 174-180。

下簡稱普查庫)、「日本所藏中文古籍資料庫」)、電子文獻(如巴圖的電子藏書)、已出版的藏書目錄(如《書目》)和古籍的複印本(如《廣州大典》〔以下簡稱《大典》〕及《清代詩文集彙編》〔以下簡稱《彙編》〕)等,編製出本文附表「海幢文獻知見錄」。「知見錄」開列跟清初至民國初年海幢文獻的編著、刊刻(或重刻)、板藏相關的 143 項資料,涉及文獻 122 種(重刻或增訂本不計算在內)。這批文獻中的 89 種見於《書目》,「知見錄」均以圓括號註明頁碼;其餘各書,亦註明藏所或書目資訊。以下從四方面論述海幢文獻的特點和史料價值,以及如何以之重建清代海幢寺歷史。

首先是該寺刊、藏和流通佛教文獻事業的全貌。以 5 年為一時段排列「知見錄」能考出刊、藏年份的 112 種文獻,數據如下:

清代海幢文獻編、刊、藏年表



由於另有約 30 種文獻未能確定其刊、藏年份（23 種由馬禮遜在 1824 年運回英國），上述的統計仍有調整空間，但是發展大趨勢仍然清楚可見。康熙末（1719）以前的刊、藏活動相對屬於小規模，各時段之間的中斷次數較多。此後的半個多世紀是快速發展期，幾乎是連續而穩定地有刊、藏活動。1784-1848 年間的情況相同，但是平均年間刊、藏量以至總刊、藏量都更高，周期時間更長。1849 年以後的刊、藏量大幅回落，後來出現短暫的回升期，且創出光緒六年（1880）年間刊刻、重刻 5 或 6 種文獻的歷史紀錄。

其次是海幢文獻的分類、內容、版本和特色。按四部分類統計，《書目》所收以子部佛教類為大宗，經最多，律次之，論最少；經類僅經文（18 種）、經疏（12 種）和撰述（17 種）3 類即占總數過半。謝輝和陳恒新按宗派分類，前者指巴圖所藏淨土著作甚多，後者則指法圖所藏禪宗著作較多。¹³ 少量非佛教文獻之刊刻或流通，亦各有原因。如《素書註》〔88〕屬兵書類，注解者為護教名士張商英（1043-1122），海幢寺亦藏其《護法論》〔98〕刻板。屬善書類的《菜根譚》〔76〕，乾隆（1736-1795）至道光（1821-1850）間於北京、常州、廣州等地的佛門流通，達天通理（1701-1782）就指出書中論說可以補過進德、療養身心。¹⁴ 有的文獻一再重刻。夏頌（Patricia Sieber）認為《金剛經》是海幢文獻中的要籍，¹⁵ 此話不差，不過《華嚴經》、《楞嚴經》及釋經著作亦有刊刻或重刻。要評估特定文獻的重要性與刊、藏原因，需要按寺院內部，佛門同道、俗家弟子與一般

13 Yeung Man Shun, "Buddhist-Christian Encounters: Robert Morrison and the Haichuang Buddhist Temple in Nineteenth-Century Canton," in *The Church as Safe Haven: Christian Governance in China*, ed. Lars Peter Laamann and Joseph Tse-Hei Lee (Leiden: Brill, 2018), 84-85; 謝輝, 〈刻經述略〉: 181; 陳恒新, 「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漢籍研究」, 頁 32。

14 楊文信, 〈從「三教合一」到「人間佛教」——論《佛光菜根譚》對《菜根譚》的傳承與發展〉, 收入程恭讓、釋妙凡主編, 《2014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理論實踐研究(上)》(高雄: 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2014), 頁 803-807。

15 Patricia Sieber, "The Jinguiguan 今古奇觀 (*Extraordinary Sights, Old and New*, ca. 1640), the Haichuang Temple's Cult of the Book, and the Representation of Buddhist Practice in Europe" (unpublished working paper), 16. 筆者已徵得夏氏同意徵引此稿。

善信的不同需要來分析。對世俗人而言，個人福壽綿長、為家人積福德是重要目的。如佛弟子梁應舉奉刊《禪門日誦》〔19〕，望以此使父母早登極樂法界。粵東陳章松因弟有咯血之症，遂虔誦《金剛經》，弟不半月而癒，遂同刊《歷朝金剛持驗記》〔65〕，以證誦經徵應之不爽。僧尼亦有刻經以求福報。如契清捐刻《禪宗永嘉集》〔69〕，望以此資薦亡親，亦願與眾生「共證真如」。¹⁶ 海幢文獻中有不少是刊刻或重刻蓮池祿宏（1535-1615）、憨山德清（1546-1623）及華首系祖師的著作，這更能說明寺方的需要或考慮。最後，道光末年起選刻、重刊海幢僧侶和本地士紳的詩集，數量約為同時期所刻書的四分之一，這與寺僧自咸豐年間（1851-1862）起集體學習詩作的時代背景相符。

透過實地考察、對比不同版本，能更準確地了解海幢文獻的特點和價值，以下舉數例說明。（1）巴圖所藏〈十法界循業發現圖〉〔83〕，由南海縣廩生石鳳臺書字。¹⁷ 此圖闡發「人天路上，作福為先。生死海中，念佛第一」之理，前此未見諸家著錄，為目前所知唯一長卷軸式海幢文獻。（2）大西和彥及張淑瓊都著錄有「清刻本」、「海幢寺經坊本」《楞伽筆記》，但未有具體說明。按此書指《觀楞伽阿跋多羅寶經記》〔21〕，《書目》著錄之為「雍正二年今但刻本」。¹⁸ 不過據今但（1657-1733）的題記，「見空比丘……請《楞伽筆記》就海幢重刻」，¹⁹ 其由該寺重刻而非原刻本無疑。（3）有關海幢寺梓刻和板藏文獻的著錄問題。「知見錄」按各書牌記、序跋等注錄由寺方梓刻／重梓／修補或補刻的文獻 30 種，另有 3 種列為存疑之類，其餘的應該都不是經坊所刻——即使書由寺僧捐資，也可能是僱人刊刻。有的文獻既由經坊梓刻亦板藏寺內流通（如〔20〕及〔28〕），計算總數時要避免重複。有些圖書館著錄所謂的海幢寺／經坊梓刻本，其

16 清·梁應舉刻，〈牌記〉，《禪門日誦》；清·陳維寧等刊，〈牌記〉，《歷朝金剛持驗記》，下卷，頁 58 上 - 下；清·契清刻，〈牌記〉，《禪宗永嘉集》。

17 清·阮元編，〈初集·目錄卷 14〉，《學海堂集》（《廣州大典》第 512 冊，廣州：廣州出版社，2015），頁 476。

18 （日）大西和彥，〈近世ベトナム佛教界と廣州海幢寺〉：85；張淑瓊，〈藏版述略〉：54；West, *Catalogue of the Morrison Collection of Chinese Books*, 182.

19 清·釋今但，〈刻《楞伽筆記》小記〉，《觀楞伽阿跋多羅寶經記》，頁 1 上 - 下。

實只是板藏流通本。(4) 部分題為同一版本的海幢文獻並不完全相同。例如《朗如語錄》，法圖本有「長白(山)書圖」序文，為巴圖本所無。又如《沙門日用錄》，亞非學院本正文首頁書名第五字作「錄」，澳洲國家圖書館藏本作「錄」(餘字作「錄」)，是此書個別板面曾有改刻。

其三是針對學術界對現存於中、日兩國的海幢文獻認識較少，查考其主要情況。其中，浙江圖書館藏善本《楞嚴正脉》〔54〕，題「乾隆五十七年海幢寺刻本，嘉慶元年李曾融跋，清姚燮題簽」，而題簽作崇禎(1628-1644)刻本。就筆者所見，此本非明刻，宜改題為「嘉慶元年李曾融跋乾隆五十七年海幢寺重刊崇禎刻本」。又該書有手書「大某山館校藏」及「怡亭姜氏藏書」等硃印，知曾為嘉慶(1796-1820)、道光間錢塘貢生姜寧所藏，²⁰經姚燮(1805-1864)校訂。國家圖書館善本《角虎集》，據書皮藍印，為徐紹柴(1879-1947)「南州書樓」舊藏。省圖藏《妙法蓮華經》為萬木草堂舊物，南京圖書館藏《寸心草堂詩鈔》為清末常州豹隱廬主人胡紹瑗舊藏。上海圖書館藏《海幢阿字無禪師語錄》及《朗如語錄》，均有安徽胡樸安(1878-1947)「樸學齋」及上海合眾圖書館藏書印。復旦大學圖書館藏《瞎堂詩集》為嘉業堂舊藏，天津圖書館藏《寸心草堂詩鈔》為吳大澂(1835-1902)舊藏。日本所藏海幢文獻多可溯源至明治、大正年間(1868-1926)。東洋文庫藏《角虎集》有朱長方「藤田鋤丰／藏書之記」，知為藤田豐八(1869-1929)舊物。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藏《菜根譚》，為金原安修(六止齋)所原有。該校人文科學研究所藏《道德經解》有朱長方印，據此知此書贈自大阪《朝日新聞》中國特派員村本英秀。關西大學藏《角虎集》有內藤湖南(1866-1934)識語，記1915年得此書於「棲菴道人」(妻木直良，1873-1934)。部分海幢文獻因藏板請入《嘉興藏》而流通各地，如《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心印》(以下簡稱《心印》)〔20〕即為《大日本續藏經》影印出版。²¹ 追蹤這些入藏歷

20 姜氏生平，參鄭志良，〈《紅樓夢傳奇序並題詞》考述〉，《紅樓夢學刊》2012.3(2012.6): 214-215。

21 楊權，〈清初嶺南禪史研究與佛教文獻整理〉，《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31.1(2014.1): 152。

史，可以了解以海幢文獻為代表、清代廣東佛教文獻在省內外以至日本的流傳情況、原藏者的收藏和學術興趣，以至對佛學研究的貢獻。

最後是海幢寺刻書的開端和經坊的設置。學界一般認為經坊之設始於順治十三年（1656），而首部「海幢經坊本」是宗寶道獨（1600-1661）的《華嚴寶鏡》〔1〕。²² 然而道獨序是書，只言是年秋「駐錫海幢……聯為一篇，命靈侍者較錄，目曰《華嚴寶鏡》」。侍者今種（屈大均，1630-1696）的跋語也只是說是年「侍老人於海幢。老人……命今種錄為一篇」，均不言該書於是年由經坊刊刻。汪宗衍（1908-1993）記此事為「道獨住廣州海幢寺，撰『華嚴寶鏡』」，²³ 亦不言其刊年。筆者未見此書原刊本，序跋語均引自道光重刻本〔107〕，個人認為暫改題原本為「順治十三年道獨序今種跋刊本」較穩妥。《龍舒淨土文》〔2〕的刊刻，道獨序文言「今夏駐錫海幢……欲剗以行」，²⁴ 而牌記題「順治戊戌年（十五年，1658）仲秋刊刻。板藏海幢寺」，這是指僱人刻書、書板藏於寺內，其時似未有經坊之名。《師子林天如和尚淨土或問》〔3〕的刊刻亦在同年，牌記題為「順治戊戌季秋識。板藏羊城海幢寺」，同樣沒有明載刊刻處所。《為山警策句釋記》〔85〕有順治十七年（1660）鄭裔序，牌記題「海幢寺經坊梓」。不過鄭序與牌記，一在書首一在書末，並無必然連繫。再者，此本依《嘉興藏》板式，而是書收入《嘉興藏》在康熙九年（1670），²⁵ 海幢寺刻本應該更為晚出，宜改題「海幢寺經坊梓康熙九年《嘉興藏》本」。海幢文獻中，「經坊」一詞最早見於康熙六年（1667）刻本《佛說四十二章經》〔4〕，牌記題此書於「經坊流通」。從建置歷史來考慮，道獨初到海幢寺，一切仍待規劃，恐難以即時建設經坊刻書。今無〈募化印

22 洗玉清，《廣東釋道著述考》（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頁143；張淑瓊，〈藏版述略〉：54。

23 清·道獨，〈序〉、今種，〈跋〉，《華嚴寶鏡》，頁2下、頁3上。汪宗衍，《明末天然和尚年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頁44。蔡鴻生亦同意此說，參氏著，《清初嶺南佛門事略》（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頁208。

24 清·道獨，〈序〉，《龍舒淨土文》，頁3下。

25 《嘉興藏》本牌記見清·釋弘贊註，《為山警策句釋記》（《廣州大典》第411冊），卷下，頁67。

經坊〉一偈，說明刊、藏佛經對流通佛法、完滿功德的意義，²⁶ 當寫於康熙元年（1662）他重返廣州以後，則經坊的運作不應早於是年。至乾隆三十四年（1769）刻《華嚴經》〔44〕，捐資名單題「海幢經坊謹識」，至此清楚顯示刻書事業以經坊為主位。

三、經僧群體的形成與發展

海幢寺屬曹洞宗華首台系統，遵道獨所定「道函今古傳心法，默契相應達本宗」法系排輩。²⁷ 今天該寺沒有保存寺僧系譜，這為重建其歷史增添了困難，而釋新成（1919-2021）對寺僧史料的搜羅、張紅及仇江等對函是（1608-1685）法系事蹟的整理，都提供了重要的文獻證據。²⁸ 清代廣東佛寺有文獻刊刻活動的，前期有端州鼎湖山慶雲寺，番禺雷峰寺，粵北丹霞山別傳寺，廣州長壽、黃華、法性諸寺和潮州靈山寺，後期有韶關南華寺和增城海門寺等；貫通兩期而具規模的，以設有經坊的慶雲、海幢二寺為代表。²⁹ 考察經僧群體的形成與發展，就是從一個獨特的視角了解廣東佛教文獻的匯聚流通和佛教界的歷史發展。以下介紹學界認識甚少的海幢寺華首系第五至十一代經僧。各輩的主要活躍時間，傳字輩在 1719-1769 年，心字輩在 1723-1803 年，法字輩在 1759-1805 年，默字輩在 1759-1835 年，契字輩在 1787-1819 年，相字輩在 1795-1862 年，應字輩在 1847-約 1888 年。

傳字輩中，傳住曾主持刊刻《佛說大乘聖無量壽決定光明王如來陀羅尼經》〔16〕，期以此書「種智共証菩提」。傳嚴是海幢嗣祖，曾主法席，

26 清·釋今無，《阿字無禪師光宣臺集》（《廣州大典》第 439 冊），卷 12，頁 575。

27 仇江，〈清初曹洞宗丹霞法系初探〉，《廣東佛教》2004.6(2004.12): 23-31。

28 釋新成，《海幢寺春秋》（廣州：花城出版社，2008），頁 125-214、273-277；張紅、仇江，〈曹洞宗番禺雷峰天然和尚法系初稿〉，收入楊權主編，《天然之光——紀念函毘禪師誕辰四百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10），頁 33-43。2008 年筆者訪問海幢寺釋光秀住持，確認該寺沒有保存寺僧系譜。

29 林子雄，〈古代廣東佛教文獻的印刷出版及其影響〉，收入趙春晨主編，《嶺南宗教歷史文化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頁 138-142。

「大唱南宗」，³⁰ 於雍正十三年（1735）輯述《比丘戒本疏義》並撰〈律制緣起〉，闡述佛陀說戒精義和戒律傳承，使僧侶知有所依，書成由傳夏捐經坊餘資刊刻。傳夏應為經坊主事者，能調度經費，乾隆二年（1737）再捐經坊餘資刊《修設瑜伽集要施食壇儀》〔25〕。繼今無任住持的古雲有法嗣傳晟，曾主雷峰席，晚年又駐錫海幢，所輯述《梵網經心地品菩薩戒疏義》〔26〕及《楞嚴經集註》〔113〕，分別由該寺梓刻和重鐫。

心字輩參與刊、藏海幢文獻的，包括古雲題跋本《洪名寶懺》〔17〕由心嚴授梓，清初刊本《佛說摩利支天陀羅尼經》〔89〕為心總所刻，雍正本《禪門日誦》由心固書字，嘉慶本《佛說阿彌陀經要解》（以下簡稱《要解》）〔64〕、《千手千眼大悲心懺》（《大悲懺》）〔70〕由心空等捐資。乾、嘉之間（1792-1803），心津亦曾 4 次捐資助刻書。此輩的代表人物當為心旦（1690-?），活躍時間長而有多方面貢獻，除於乾隆初年校刻《大乘起信論直解》〔31〕，又於三十三年（1768）重刊《雲棲大師遺稿》〔43〕並為撰序，說明此書的研習價值為：

《（佛說阿）彌陀（經）疏鈔》，海幢經坊先已重刻出請。但《遺稿》一書，乃老人（株宏）末後梢頭，剴切丁寧要語……實為《疏鈔》後分……遂捐資重刊流通，冀諸同志……味此遺文。³¹

可見先賢著作就如指路明燈。三十五年（1770），心旦為其《角虎集》〔45〕作序，自言是書之刻乃針對僧侶讀佛書「欣簡厭繁者多」，遂將原書「刪去繁枝」，以廣流傳。³² 至三十七年（1772），心旦以八十二高齡，尚與潮州開元寺傳修捐資重梓《金剛（經）直說》〔46〕。海幢寺經僧典範，心旦當之無愧。

法字輩的法真字朗如，為海幢嗣祖，其講經說法語，由默演記集、刊刻為《朗如語錄》。乾隆本《華嚴經》為跨代經僧合作刻經的成果，捐助者除傳鞠、心旦外，法真所捐 40 兩，為寺僧最大宗個人捐資，其餘捐資

30 張紅、仇江，〈曹洞宗番禺雷峰天然和尚法系初稿〉，頁 36。

31 清·心旦，〈序〉，《雲棲大師遺稿》，頁 1 下。

32 清·心旦，〈序〉，《角虎集》，頁 2 上-下。

者，有法亘、法一、法濬及法鳳，而默字輩有 11 人。法鳳又曾捐資重刊《化生儀軌》〔100〕。法一字本無，曾主席海幢。《角虎集》的選刻，緣於法一「一見此書，恨讀為晚，即捐衣鉢鏤板」，而其流通「利益甚普」。³³

由默字輩起，經僧群體更具規模。默寶曾任住持，共 4 次捐資助刻書。默印於乾隆末至嘉慶中期（1795-1810）7 次參與刻書活動，包括主持刊刻《金剛經》〔58〕，集資重刻《六道集》〔59〕，助刻《要解》、《解惑編》〔74〕和《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宗通》〔75〕等，又捐全資刻《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論》〔67〕。默持曾為法真侍者，主持增刊《禪門日誦》〔53〕，又為翻刻《八識規矩頌略說》〔51〕撰序，謂此書能「發明唯心唯識之旨」，學者以之修心，可謂能尋流得源。³⁴總計 16 年（1792-1808）間，默持 8 次參與刻書工作。

契字輩主要成員參與刻書活動的次數亦多。契誠於 11 年間（1792-1803）7 次捐資助刻，又主持刊刻《金剛經》〔61〕；契清曾任住持，嘉慶間亦 7 次捐資。契泉約於同時（1795-1819）亦 7 次捐助刻書，又因善書法，《（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經》〔56〕、《金剛經》〔61〕、《地藏經》〔66〕、《大悲懺》均由其為刻板書字。契和、契次先後任職知經（治經）。契和為《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如義》〔50〕作序，謂是書為華林寺鐵航老人（元海）集古尊宿注疏精義的釋經之作，華林座下奉為洪璧。海幢寺默光得其手抄，常願繡梓以廣流通。及契和任知經，「適護法雙玉倪公（珏）請經」，「一見歡喜，捐金敬刻」。³⁵由是知是書之刻契和功不可沒。契次於嘉慶中期 3 次捐資助刻，其序《菜根譚》，追述刻書緣起為：

是書……其言簡而明，其義顯而妙。雖未可比之大乘經，抑亦度世之筏航、入道之階梯也。惜板存外省，不能徧布，欲刊藏本寺，又自維棉蕞。適張（應振）、謝（孟苻）二居士枉過，見而稱之，願付剞劂。³⁶

兩段序文都以「適」字形容佛弟子的捐資，看似巧合，其實是經僧熟知文

33 清·心旦，〈序〉，《角虎集》，頁 2 上。

34 清·默持，〈翻刻《八識規矩頌略說》〉，《八識規矩頌略說》，頁 1 上 - 下。

35 清·契和，〈序〉，《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如義》，頁 1 下。

36 清·契次，〈序〉，《菜根譚》，頁 3 上 - 下。

獻的價值、長期留心搜集、保存書板和聯繫捐助者以待時機的結果。

相字輩經僧人數更勝前輩。相種為《金剛正法眼》〔106〕作跋語，言此書：

原板朽腐，每欲翻刻，奈未便緣。雖鐫銖之費，亦必待時乃就。曉山王君，直隸燕平（北京昌平）人也，遊粵多年，常過禪室。同論宗乘，遍閱斯帙，殊覺境智歷然、身心廓爾。立訂重梓，傳播流通。³⁷

再次說明經僧在物色捐資的重要角色。其為《華嚴寶鏡》〔107〕題識語，願流通此書使眾生「共入毘盧性海」。³⁸相柱字瑜山（餘刪或瑜珊），受業香山隱泉寺，後主海幢法席，日課《金剛經》垂四十載。嘉慶二十年（1815）任知經，其序《讚本》〔80〕，強調念經禮懺的度世意義：

經懺法事，雖屬應世之文，實度世之梯航也。念經者，念念不失經義，則心體常明。禮懺者，懺其平時過失，則罪無叢生。積誠既久，則三界六道，無感不通，自利利人，莫此為最。³⁹

相柱參與刻書事業橫跨 32 年（1815-1847），詳情仍待查考。例如《高上玉皇本行集經》〔109〕，有佛弟子昆明人李孝光跋語，言「自滇請至粵省。聞乏此板，虔心公刊。托海幢寺瑜山大師請工鐫板印傳，以廣洪道」，⁴⁰則此書的鐫刻，相柱當記一功。此外，相松曾手書並捐全資刊刻《佛說天中北斗古佛消災延壽妙經》〔111〕，相潤也曾助刻《解惑編》。相匯（?- 約 1862）為道光二十七年（1847）住持，是年與募緣僧相柱、應基（1798-1857）重刊《沙門日用錄》〔120〕。元珠法號相圓，亦曾任住持，曾助刻《慈悲道場懺法》（以下簡稱《梁皇懺》）〔127〕及他書。

由「相」到「應」字輩，海幢文獻的刊、藏事業轉走下坡，而「知見錄」所列道光末年起的 4 份刻書捐資名單（〔117〕、〔121〕、〔125〕、〔127〕），

37 清·相種，〈跋〉，《金剛正法眼》，頁 1 下。

38 清·相種，書末〈識語〉，《華嚴寶鏡》。

39 清·相柱，〈序〉，《讚本》，頁 1 上 - 下。

40 清·李孝光，〈跋〉，《高上玉皇本行集經》，卷下，頁 21 上。

都由著錄僧侶法號改為字與名。應字輩曾捐資助刻書的，有悟非應聞、榮芳應濟，均相匯門人；又有爾勤應喜（1805-1862）、靈苗應基、二嚴應濟、迪昌應祺、戒珠應護、遜怡應習及潤芳應譜。⁴¹此輩的領軍人物當為穎勤應愉，相益（1792-1858）嗣法門人。梁恭辰（1814-1887）言穎勤為永勝寺僧，工篆書及詩，後長居海幢寺。穎勤的詩作，今天只殘留片言隻句，⁴²其經僧的歷史地位遠較重要，參本文第五節。

經僧與詩僧性質不同、各有貢獻，但不是截然劃分的兩類人，今無即既能詩文又推動經坊建設。前述的相潤字秀林（琇琳），詩格清妙，著有《竹筭吟卷》。契生字隱禪，以詩集《慧海小草》〔108〕名，嘗於嘉慶間3次捐資助刻書。相益字純謙，主海幢法席，著有《片雲行草》〔119〕，曾助刻嘉慶本《光宣臺集》〔82〕及他書。寶筏（1838-1891），海幢住持，有《蓮西詩存》，曾捐銀助刻《梁皇懺》。應字輩工詩者有惺勤應牧，曾主持隱泉寺，戒律精嚴，著有《隱泉詩草》，後又捐助重鐫《百丈叢林清規證義記》（以下簡稱《清規》〔125〕）。⁴³以上數僧以詩學揚名，然而其為經僧之一員且作出貢獻，亦為事實。

過往研究海幢寺的論著，甚少注意非華首台系駐錫僧侶。海幢文獻於他處寺院僧尼的捐資，都會註明身分；於本寺僧侶則不加註明，而所具為各僧法號，這個習慣延續至道光末年。⁴⁴乾隆本《華嚴經》有照道捐13大員，通平、與修各捐4大員，都是非華首台系。捐助乾隆本《楞嚴正脉》的有遂成、通慧，通慧又於嘉慶元年（1796）、四年（1799）和八年（1803）捐助

41 法號與名字的配對，載釋新成，《海幢寺春秋》引錄廣州白雲山海幢歷代祖師墓塔碑（頁274-277）。碑文載悟非為第九世僧（頁277），應屬契字輩，然而其嗣法門人屬達字輩。按悟非活躍於道光末、捐資排序在應愉之後，應該同屬應字輩。

42 釋新成，《海幢寺春秋》，頁274。清·梁恭辰，《楹聯四話》，收入白化文等編，《聯話叢編》第4冊（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卷2〈名勝·廟祀〉，頁2488。清·梁鼎芬等修，丁仁長等纂，《（宣統）番禺縣續志》（《廣州大典》第279冊），卷43，頁630又收穎勤詩作。

43 清·田明曜等修，陳澧纂，《（光緒）香山縣志》（《廣州大典》第297冊），卷20載應牧為相柱弟子（頁420），墓塔碑則言其為相匯嗣法門人（頁275）。

44 例如《百丈叢林清規證義記》的助刻名單中，海幢、華林兩寺均有僧名「榮芳」，故須加註明。

刻書，這顯示 11 年間（1792-1803）他至少 4 次駐錫寺中，甚至長駐於此。《普照禪師修心訣》〔55〕的捐資者，有「比丘：祖本，壹大員；照波，壹大員；先定，壹中員；薦社，貳錢五分；契誠，壹大員。佛弟子：余明志，壹中員；盧富昌，壹中員」，⁴⁵ 不論從排序、金額還是法系而言，非華首台系都是主導者。祖本其後於刊刻乾隆本《念佛往生西方公據》〔57〕、《大悲懺》又有捐助，其於寺中至少亦斷續近 10 年（1793-1803）。因此，要考察海幢寺刻書事業的實態，就不能停留在「寺」而要推進至法系和「僧」的層面。

海幢僧侶之跨輩合作刊、藏文獻，乾隆中期以前已經出現，而越到後來趨勢越見明顯。「知見錄」所列 15 次有人名可查的合作捐資中，乾隆五十七年至嘉慶十五年（1792-1810）的 19 年間共占 9 次。從參與人數而言，不足 10 人的占 4 次，10 人或以上的占 2 次，20 人或以上的共 6 次，30 / 40 / 60 人或以上的各 1 次；嘉慶後期起的合捐，人數都在 20 以上。據西方訪客的記載，1830-1880 年代之間，海幢僧侶的數目由 140、160、174 或 175 至 200 人不等。⁴⁶ 因此參與合捐的，以占寺僧約八

45 清·契誠等重梓，書末〈捐資姓氏〉，《普照禪師修心訣》，頁 26 上 - 下。其時流通的洋錢以西班牙銀員為主，大的約重 7 錢 2 分，中的是半元即 3 錢 6 分，小的 1 錢 8 分。以洋員折算紋銀，每（大）員按 0.72 兩計算，這個換算率在海幢文獻得到證實。洋錢與銀兩的兌換，參王宏斌，《清代價值尺度：貨幣比價研究》（北京：三聯書店，2015），頁 207；Paul A. Van Dyke, “Smuggling Networks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before 1842: Implications for Macau and the American China Trade,” in *Americans and Macao: Trade, Smuggling, and Diplomacy on the South China Coast*, ed. Paul A. Van Dyke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2), 66.

46 參 Anders Ljungstedt, *An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Portuguese Settlements in China* (Boston: James Munroe & Co., 1836), 263-266. (所載為 175 人)；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Report of 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vol. 39 (Boston: Printed for the Board, 1848), 165. (所載為 140 人)；Edmund Roberts, *Embassy to the Eastern Courts of Cochin-China, Siam, and Muscat*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837), 70. (所載為 174 人)；George Smith, *A Narrative of an Exploratory Visit to Each of the Consular Cities of China* (London: Seeley, Burnside & Seeley etc., 1847), 34. (所載為 160 人)；Samuel W. Williams, *The Middle Kingdom* (New York: Wiley and Putnam, 1848), 133. (所載為 175 人)；Catharina Van Rensselaer Bonney, *A Legacy of Historical Gleanings* (Oakland: J. Munsell, 1875), 314-316. (所載為 175-200 人)；John

分之一或以上的情況居多。較大規模的兩次，一次在刊刻《梁皇懺》，由30寺僧助刻。另一次是《大悲懺》，心、默、契、相四輩38人，非華首台系25人，俗家弟子12人，並有書坊助刻。海幢文獻刊、藏事業全盛期的景況，於此可以推想。

四、刻書事業與清代文網

康熙朝（1662-1722）中後期，海幢僧侶進入第四代古字輩，逐漸從改朝換代的時代巨變走向新朝盛世。海幢文獻如《佛說阿彌陀經》〔42〕及《念佛往生西方公據》的刻書牌記，在常見的「皇圖鞏固、帝道遐昌」語句之上，都書有「大清乾隆三十年」年號；如謝輝所言，海幢文獻也遵守朝廷功令避清帝名諱。⁴⁷康熙至乾隆年間，海幢寺刊、藏的文獻絕大部分屬佛經和注經釋經之作，與文化及思想統制並無直接衝突；然而祖師輩涉及明末清初史事與人物的著作，則另作別論。吳哲夫注意到清廷曾藉編修《四庫全書》而對宗教書刊加以審查。⁴⁸乾、嘉之間文網的嚴與寬，對海幢文獻的刊、藏和流布有怎樣的影響？

禁燬書與海幢寺有關的有以下三例。雍正八年（1730），屈大均的著作受曾靜（1679-1735）案牽連，被官方飭令銷燬，但限於書坊及親屬所藏者；至乾隆朝，屈氏著作遭全面禁燬。今釋為今無同門，關係密切。乾隆四十年（1775），高宗（愛新覺羅弘曆，1711-1799, 1735-1796在位）閱各省呈繳應燬書籍內有其《徧行堂集》，「多悖謬字句」，下令毀今釋遺著墨跡、不許其支系接掌住持。經辦的兩廣總督李侍堯（?-1788）卻將其

Henry Gray, *China, A History of the Laws,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People*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1878), vol. 1, 117. (所載為200人); C. F. Gordon Cumming, *Wanderings in China* (Edinburgh and London: William Blackwood and Sons, 1886), vol. 1, 64. (所載為200人).

47 謝輝，〈刻經述略〉：178-180。

48 吳哲夫，《四庫全書纂修之研究》（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0），頁60。楊健，《清王朝佛教事務管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從典籍、教義及教派管理的更大範疇探討清朝的佛教事務管理，參見頁224-313。

支系悉行逐出，並奏請凡採入今釋詩文的志乘均「提板鏟削」。⁴⁹ 函可與函昱為同門，其著作亦被高宗斥為「語多狂悖」，《禁毀書目》載軍機處議奏：「查《千山詩集》，釋函可撰。函可與金堡唱和，詞氣狂悖，應請銷燬。」⁵⁰ 受今釋案牽連而遭禁燬的佛教文獻，其載於《禁毀書目》者，除其本人著作外，還包括他書載及其事蹟或詩文者，包括古如《丹霞語錄》、陳世英《丹霞山志》、馬元及釋真樸《曹溪通志》、徐作霖（?-1642）等輯《海雲禪藻集》等，而這些文獻又被指為語多「妄誕／悖誕」、「違碍」或「冗雜不倫」。這個環繞華首系僧侶著作的禁燬風潮波及海幢寺。《禁毀書目》又載：「查《光宣臺集》及《尺牘》，釋今無撰，今無與金堡同時，中多唱酬之作，應請銷燬。」「查《瞎堂詩集》係明釋函昱撰。集內多狂誕之語，應請銷燬。」「《天然（和尚）語錄》……（函）昱行狀係金堡所作，語句亦有干犯處」，最終各書均被列入軍機處奏准的「全燬書目」。⁵¹ 清廷搜查禁書的活動及於廣東寺院。如搜查《徧行堂集》，曲江知縣於曹溪寶林寺發現今釋重編的「《獨和尚語錄》」（《長慶宗寶獨禪師語錄》，以下簡稱《長慶語錄》）後上報朝廷，軍機處回覆以將今釋敘文及其重編之處一併銷燬。⁵² 康熙本《光宣臺集》未明載刊板資訊，然是集既由今無弟子古

49 參〈兩廣總督李侍堯等奏遵旨查辦《皇明實紀》《徧行堂集》並椎碎澹歸碑石摺（乾隆四十年十一月十六日）〉，收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頁 477-479。

50 張捷夫，〈屈大均及其著作的厄運〉，收入何修齡、朱憲、趙放編，《四庫禁毀書研究》（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頁 191-196；張玉興，〈奇人奇遇奇詩奇語——評釋函可及其《千山詩集》與《千山語錄》〉，收入何修齡、朱憲、趙放編，《四庫禁毀書研究》，頁 220。清·姚觀元編，《清代禁毀書目四種》（《續修四庫全書》第 921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所收《禁毀書目》，頁 481。《千山語錄》亦因「函可與金堡善，語多悖誕」而受禁，見同書頁 483。

51 所列各書參清·姚觀元編，《清代禁毀書目四種》，《禁書總目》，頁 424；《禁毀書目》，頁 481-483 及 514。吳哲夫，《清代禁毀書目研究》（臺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1969），頁 214。

52 參〈兩廣總督李侍堯等奏遵旨查辦陳建金堡遺書板片摺（乾隆四十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收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頁 493；上海古籍出版社編，《清代文字獄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頁 169 引錄軍機處檔。

正及古雲編輯，其刻板當存於海幢寺，而在查禁過程中也應該被燬。

相對於經部，史子集三部著作犯禁的機會較大。曹剛華認為禁燬活動對佛教史籍的刊刻流通，影響只限於三兩部史書，⁵³ 這有可商榷之處。王汎森提出，因應禁燬書籍而進行自我審查的「漣漪效應」，會波及大批不在禁書名單的著作，形成官不禁而民自禁、自我審查較官方審查為嚴厲的情況，而這是難以量化統計的。⁵⁴ 海幢寺沒有因禁燬書風潮受到懲處，然而寺方在細微處的顧慮和應對，則仍留有線索可查，可以以《羅浮山志會編》（以下簡稱《會編》）〔48〕說明。

《會編》屬史部地理類，現存刻本分為兩個系統，一為宋志益刻本，有《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本；二為「板藏海幢寺」本，刊年不詳。《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雖題所據為康熙五十六年（1717）刻本，但其實與《故宮珍本叢刊》影印本均屬海幢寺本。海幢寺本流通甚廣，劍橋大學、利茲大學、法蘭西學院、愛知大學、京都大學及中之島圖書館等均有收藏。筆者見過的宋志益刻本，內文都有挖空處，顯然非康熙原刻；海幢寺本的挖空處更多，當屬再改本。以書首〈纂輯書目〉為例，海幢寺本將《瞎堂詩集》、《光宣臺集》、《徧行堂集》、德清《（憨山老人）夢遊集》以及屈大均、鈕琇（1644-1704）、陳恭尹（1631-1700）著作的相關條目均予挖空。《夢遊集》由錢謙益（1582-1664）校訂，海幢寺僧曾參與是集的彙集整理。錢氏著作受禁於乾隆年間，但此書未列為禁書。鈕、陳的著作則因語多涉明末清初史事，同被列為禁書。⁵⁵

海幢寺本的挖改並不嚴謹。此本於世宗（愛新覺羅胤禛，1678-1735, 1722-1735 在位）、高宗名諱均有所避，加上前述的挖改痕跡，藏板當改於乾隆四十年代。不過書中避諱並不澈底，「崇正」與「崇禎」、「萬歷」與「萬

53 曹剛華，《清代佛教史籍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頁 115。楊權整理受禁的文獻，參氏著，〈清初嶺南禪史研究與佛教文獻整理〉：147-154。

54 王汎森，《權力的毛細血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頁 606-610。

55 錢、鈕著作之受禁，參（日）岡本さえ，《清代禁書の研究》（東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1996），頁 380-386、406-407。

曆」並存；⁵⁶ 於官方明令禁燬的《廣東新語》，又殘存其書名及若干條目。此本的挖改重點更在華首系祖師輩的著作，正文各卷中函是、今無及今釋的小傳及詩文均被挖去，不過他人作品中提及今無等及其著作之處則多不加處理。⁵⁷ 另一值得注意之處是，此本的京都大學藏本卷 15 頁 28 有重複頁：首 28 頁上為〈羅浮蝴蝶歌送屈翁山〉而頁下空白；次 28 頁上為〈冲虛觀〉而頁下為〈羅浮黃龍洞對雪〉，均屬陳恭尹詩作。中之島圖書館藏本頁 28 上下亦有重複頁，但次序與京大本相反。香港大學圖書館藏陳君葆（1898-1982）贈本，頁 28 上首 5 行原被挖空（即與《故宮珍本叢刊》本同），但有補紙貼上原刻陳氏詩作。以上事實說明：（1）海幢寺本的早期流通本殘留可能犯禁的篇章，相信挖改者認為不妥，遂將相關板頁改板再印，而後來個別刻本補回個別篇章。（2）民間沒有能清楚掌握禁燬的準則、範圍和完整資訊，⁵⁸ 禁令也沒有貫徹。《會編》並非禁書，只因載及《徧行堂集》內容而將相關之處鏤毀。海幢寺本的挖改者無疑知悉《光宣臺集》、《瞎堂詩集》為禁書，不過清廷並無要求將此二書的內容從地方志書鏤毀；何況《夢遊集》亦非禁書，則挖空之舉全出於挖改者自身的顧慮，寧可一概挖去，以免受牽連。既然書板明示為海幢寺藏板，而挖改的主要目的又在隱去祖師輩名諱及著作，則施加者即使不是寺方，也必然是有密切關係者。這充份說明民間自我審查違禁書的意識在蔓延，即使寺院藏板亦不能倖免。因編修《四庫全書》引發的禁燬書活動至乾隆四十八年（1783）大幅回落，至五十八年（1793）告終，⁵⁹ 此時正值海幢寺刻書事業處於上升軌道的十年低潮期，兩者的關係值得深思。

56 故宮博物院編，《故宮珍本叢刊》第 263 冊（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所收。避諱以「正」代「禎」見卷 9，頁 151-152；不改之例見卷 3，頁 77；避「曆」字諱，見卷 6，頁 117；不避之例見卷 2，頁 61。

57 「海幢寺本」《會編》引《廣東新語》之例見卷 6，頁 121、卷 8，頁 145；轉述中提及今無等人著作之處參卷 21，頁 329。

58 乾隆四十七年（1782）禁書書目編成，官方才具備判斷違礙書的標準，參 R. Kent Guy, *The Emperor's Four Treasuries: Scholars and the State in the Late Ch'ien-Lung Era* (Cambridge, MA: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87), 193-95.

59 （日）岡本さえ，《清代禁書の研究》，頁 72。

被禁燬的文獻是載體，清廷要抹去的是「違礙」的歷史、對這些歷史的認識和記憶。不過禁令難以持久，禁書在嘉慶朝開始獲重刻，到道光朝大量重現。屈大均詩作的選刻在嘉慶十五年，其《道援堂集》及《廣東新語》的重刻在二十五年（1820）。⁶⁰ 海幢寺於重刻華首系祖師被禁燬的著作擔起領導角色。嘉慶本《光宣臺集》由契、相兩輩合資，契清位列名錄之首，相種、相柱、相潤、相松等均有參與。不足之費，由常住捐銀補足，即是以寺院名義主持其事。其時禁書可在民間流傳，馬禮遜的藏書就收有此集。重刊本的內容與康熙本基本相同，雖無序跋說明重刻原委，而今釋的原序仍見於書首。道光二十二年（1842），此集由佛山彌陀閣及廣州永勝寺兩常住合資修補，⁶¹ 可見其價值獲得佛門同道認同。

海幢寺更大規模重刊祖師輩被禁燬的著作見於道光後期，是《長慶語錄》、《瞎堂詩集》和《千山詩集》〔121-124〕同刻，集資規模更大，《瞎堂詩集》且有重印本。據該集所載捐資表，捐款來自同一法系的華首、海雲、海幢及大佛四寺的常住和僧侶，僧侶達 124 人。常住捐款額，海幢寺以 20 兩稱冠；捐款人數及金額，該寺亦以 43 人共 90 員為最多。⁶² 重刻的有兩部是詩集而非佛經，時代、歷史意義較諸宗教氣息更為濃厚。《千山詩集》有道光六年（1826）進士陳其鋌所書函可詩句；《瞎堂詩集》有道光二年（1822）進士張維屏（1780-1859）題函是畫像贊詞，點明要從遺民身處儒、釋之間的時代背景來解讀此集。⁶³ 詩集中函是有何「狂誕」語、函可為何「詞氣狂悖」以致獲罪，這有待讀者重新理解和評價。重刻

60 劉乾，〈論道光年間的重刻禁書〉，《文物》1986.6(1986.6): 61-67；張捷夫，〈屈大均及其著作的厄運〉，頁 196。

61 捐資題記見清·釋今無，《阿字無禪師光宣臺集》，頁 782。

62 清·釋函昱著，李福標、仇江點校，〈前言〉，《瞎堂詩集》（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6），頁 7。清·釋函昱，〈重刊《長慶語錄·瞎堂·千山詩集》捐資列〉，《瞎堂詩集》（《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 116 冊），頁 672。捐資者之一應基卒於咸豐七年，是書的重刻當在此前。

63 徐桂秋，〈《千山詩集》影印前言〉，收入蔣寅、于景祥主編，《清代東北流人文獻集成》第 1 輯（瀋陽：遼海出版社，2016），頁 6。張維屏，〈天然和尚像贊〉，收入清·釋函昱，《瞎堂詩集》（《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27 冊），頁 447。

禁燬文獻為契、相、應三輩的經僧身分賦予另一重意義：在文網初開時承擔重振宗風的使命，而這股宗風與明末清初的歷史緊密結合。再者，《長慶語錄》本由丹霞今釋重編，《千山詩集》與《瞎堂詩集》分別由黃華、海雲兩寺原刻，而重刻工作均由海幢寺主持，可見刻書事業讓該寺成為嶺南華首系的重心。最後，道光末年重刊受禁的佛教文獻並非偶發現象。成鷲（1637-1722）《咸陟堂詩文集》在乾隆朝亦因「集中詞氣多涉憤激」而被燬。⁶⁴此集於道光二十五年（1845）由華林寺僧重刊，捐資的包括嶺南士紳和佛寺，海幢寺相柱與穎勤等亦名列其中。捐資重刻禁燬書、為其撰寫題記，都是建構身分認同的一種方式；今後研究海幢經僧，考察契、相、應三輩，於此當特加注意。

五、佛教文獻的刊刻流通與寺外的捐助社群

據「知見錄」，海幢文獻的刊、藏捐資中，約 66 次來自僧侶（包括僧尼），33 次來自俗家弟子和信眾，約 13 次為雙方合作，可見來自寺院以外的捐助十分重要。同一捐助者的捐贈，多數在 1-3 次之間，捐額小至 1 文而多至全額，一般在 1 兩或 1 員以下。廣東官員於海幢寺的營建作出過不少貢獻，但就目前所知，他們極少參與文獻的刊、藏活動，如康熙十五年（1676）刻《徧行堂集》般集合各級官員的捐助更屬闕如。⁶⁵個別例子見於清朝前中期的，如平南王尚可喜（1604-1676）麾下「信官劉承業、馬必騰、趙天元」刊刻《妙法蓮華經》〔5〕，是「願福祿之永增，獲果報以咸慶」。⁶⁶《天目中峰禪師垂示法語》〔32〕由鎮粵將軍錫特庫撰序文，說明是寺僧「旭堂」（心旦）攜此書見示，而他於「公餘之暇展閱，

64 清·姚觀元編，《清代禁毀書目四種》，《禁書總目》，頁 430；《禁毀書目》，514。

65 清·釋今釋著，釋古理、釋古習編，《徧行堂集》，書首〈姓氏〉，頁 232-233。

66 《大乘妙法蓮華經》，卷 1，頁 33 下劉氏等題字。據清·馬齊、朱軾等撰，《清聖祖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1987），卷 81「康熙十八年六月壬申」條，趙天元「本係平南王所屬之人」（頁 1037-1038）。劉、馬二人曾督工興建南華寺，參清·馬元著，釋真樸重修，《（重修）曹溪通志》（《中國佛寺史志彙刊》第 2 輯，臺北：明文書局，1980），卷 3〈王臣外護〉7 之上，頁 281 及 283。

偶有少會處，隨手錄之」，積時日而成。⁶⁷《今雨堂詩墨》〔34〕收錄乾隆七年（1742）狀元金甡（1702-1782）詩作，金氏與海幢僧侶有長期交往，故書成而板藏經坊流通。此外，《慈悲十王妙懺法》〔95〕為「信官張朝臣」所刻，惜未詳其生平。相比之下，俗家弟子、一般善信及其家族才是捐助主力，有的是個人捐助，如鄭時保助刻《佛說四十二章經》；有的由父子合刻，如《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71〕及《般若無盡藏真言》〔72〕，分別由「信士劉傑遠」、「弟子謝濤」率兒輩刊刻。也有一家合刻，如《法界安立圖》〔9〕由曾光達領妻兒發心施財，曾氏序文指眾生難明大法；是圖之刻，販夫愚婦但依次順覽，即皆獲信種。⁶⁸

身分可略為查知的捐助者，多屬廣東中下層士紳，也有寓居的外省人士。《六祖大師法寶壇經》〈弁言〉〔13〕載刻書緣起為：

予素味其（《壇經》）指……欲刊布而未遑也。幸哉，海幢鐵關上人（古鍵，1652-1697）願充募化……重以吾族姪希甫將伯之助，刊布流通……廣而行之。⁶⁹

此書募得「捐資刻經弟子」16人而陳姓占半數。位列第二的陳觀光為順德人，康熙間歲貢生；⁷⁰位列第三、撰寫〈弁言〉的「無上道人」陳際臨亦順德人，康熙二十年（1681）舉人，三十四年（1695）任儋州學正，⁷¹與位列首位的陳慧對應為同族人。另有李雲珩，香山人，康熙四十七年（1708）恩貢，授吳川訓導。⁷²由此可見，是書之刻由古鍵主導而以陳氏

67 清·錫特庫，〈選刻中峰本禪師《法語》序〉，《天目中峰禪師垂示法語》，頁1上。

68 清·曾光達，〈序〉，《法界安立圖》，頁1下-3下。

69 清·陳際臨，〈重刻《法寶壇經》弁言〉，《六祖大師法寶壇經》，頁1下-2上。

70 清·戴肇辰修，史澄纂，《（光緒）廣州府志》（《廣州大典》第269冊），卷53〈選舉表二十二〉，頁172；清·郭汝誠修，馮奉初纂，《（咸豐）順德縣志》（《廣州大典》第283冊），卷25〈列傳五·國朝一〉，頁648。

71 清·戴肇辰修，史澄纂，《（光緒）廣州府志》，卷42〈選舉表十一〉載陳際臨為慧峯孫（頁21）；陳志儀修，胡定纂，《（乾隆）順德縣志》（《廣州大典》第282冊），卷12〈宦績〉則謂為慧峯長子（頁608）。又參清·韓祐纂修，《（康熙）儋州志》（《故宮珍本叢刊》第193冊），卷1〈學正·國朝〉，頁41。

72 清·暴煜修，李卓揆纂，《（乾隆）香山縣志》（《中山文獻》第28冊，廣州：廣東

為捐資主力。同縣有佛弟子張元洪、榮洪、鉅洪，於乾隆五十七年共梓《佛說大阿彌陀經》〔52〕；同年重梓《楞嚴正脉》，元洪亦有捐資。捐資以外，儒士自述其參與刊刻佛經的態度值得注意。古新州（新興縣）黎嘉謀捐資刊《金剛決疑解》〔22〕，其跋文重點在闡發以儒為本、儒佛相通的觀點：

《金剛》一經，無非度人，明心見性，實與儒經相通。其所云金剛般若，即明明德也；所云滅度眾生，即自新新民也；所云如來，即率性也；所云降伏，即求放心也；所云忍辱，即犯而不校也。則吾儒又安可以為釋氏之空談而不為參究也耶。⁷³

黎氏為例貢生，康熙四十三年（1704）授儒學訓導銜；此書由子孫同梓，子逢源、逢津均為監生，逢湛為縣學武生員。⁷⁴ 晚清番禺文士相助刻書事業的，包括《金剛正法眼》由陳廷本書字，《慧海小草》由「番禺禪客」區昌豪題字、洪應晃撰序，⁷⁵《佛說高王觀世音經》〔112〕由彭尚志繕寫等。

海幢寺的地區連繫網也包括外省寓粵者。前述契泉手書《地藏經》，由山陰魯松峰刊刻，魯氏於乾隆末年設有「羊城魯氏觀德書屋」，刊刻其注釋《周易》等著作。上虞倪珏在捐刻《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如義》的 14 年後，於嘉慶六年（1801）刻《蓮宗輯要》〔68〕時又有參與，不過這次是他所屬的浙籍群體的捐助。從款額言，山陰樊念曾所捐 10 員為最大額；從籍貫言，山陰 7 人，上虞 3 人，仁和、蕭山、會稽、苕霅（湖州）、錢塘及晉安（或指福州）各 1 人。除倪珏外，餘者姓名均未有在前此的海幢文獻出現，顯示他較可能是捐資的推動或聯繫者。這個群體至少有部分人寓居在粵，如樊、倪二人均長期活躍於廣州及附近地區。⁷⁶ 又從所刻文

人民出版社，2017），卷 5〈選舉·鄉貢〉，頁 416。

73 清·黎嘉謀，〈跋〉，《金剛決疑解》，頁 1 上-2 上。

74 清·劉芳纂修，《（乾隆）新興縣志》（民國二十三年〔1934〕鉛印本），卷 20〈選舉·肇慶府學〉，頁 24 下、35 下、39 下及 46 上。

75 歐、洪二人生平，參清·戴肇辰修，史澄纂，《（光緒）廣州府志》（《廣州大典》第 271 冊），卷 131〈列傳二十〉，頁 74-75。

76 清·戴肇辰修，史澄纂，《（光緒）廣州府志》（《廣州大典》第 268 冊），卷 27〈職

獻分屬天台宗僧人元海、達淨的著作來考慮，因應群體自身需要或推廣天台學著作應該是捐助的重點。

女性參與刊、藏海幢文獻，過往少獲注意。個人的捐助，康熙間有女尼古松發心捐資刊刻《四分比丘尼戒本》〔7〕，期此書於經坊永遠流通；又刻《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12〕，「祝願人人同登覺海」。⁷⁷合力刻書的有傳庸、心寧、心一，同刊《（請）諸天科儀》〔14〕及《金光明經》〔15〕，期此二書流通，「人人盡契真如」，亦望彼等於現生福壽增崇，於未來世智慧圓足。⁷⁸僧尼合刊佛經的，如《洪名寶懺》由女尼正岸等捐資、僧心嚴授梓；乾隆間重刻《指月錄》〔28〕，有傳福及傳持兩師太各捐 10 兩。此古、傳、心字輩女尼可能也屬華首台系統，清初函是一系弟子就有同修的親眷；⁷⁹惜限於史料，是否屬實仍待查證。女信眾的捐資，至清中葉才有記載。乾隆本《華嚴經》的唯一俗家捐資者為「信士沈起宗，肆大員」。⁸⁰信女沈門吳氏，拾大員。沈門俞氏，肆大員。金門沈氏，貳大員；從捐額言，吳氏才是主力。又如乾隆本《楞嚴正脉》，海幢寺僧所捐 7 員占總捐資額不足半成。雖然最大宗的捐資來自李普融（55 兩，為有款額可查最大宗的俗姓捐助），⁸¹但從姓名排序（首 4 人張姓）和人數（張姓

官表十一·新寧縣·縣丞主簿典史巡檢大使〉載：「樊念曾（原注：山陰人，議敘，〔嘉慶〕三年任）」（頁 475），樊氏任期應至五年（1800）。周之貞、馮葆熙修，周朝槐纂，《（民國）順德縣志》（《廣州大典》第 284 冊），卷 7〈職官·知縣〉載樊氏於十五年任縣令（頁 6 下）。倪珏曾於嘉慶十三年（1808）其族人出售廣州產業時作證，參張啟龍、徐哲，〈被動的主動：清末廣州高第街婦女權利與地位研究——以契約文書為例〉，《婦女研究論叢》2015.2(2015.3): 98、102-103。

77 清·古松，〈牌記〉，《四分比丘尼戒本》，頁 46 上；清·古松，〈牌記〉，《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頁 52 下。

78 清·傳庸、心寧、心一，〈牌記〉，《（請）諸天科儀》；清·傳庸、心寧、心一，〈牌記〉，《金光明經》，卷 1，頁 20 上。

79 參蔡鴻生，《清初嶺南佛門事略》，頁 156-159；簡瑞瑤，〈明清之際粵東佛教的親眷型態——兼論女性出家〉，《玄奘佛學研究》25(2016.3): 1-33。

80 此人或為乾隆四十五年（1780）運商（鹽商之一），參清·陸向榮修，劉彬華纂，《（道光）陽山縣志》（道光三年〔1823〕刻本），卷 5〈經政·鹽課〉，頁 38 上。

81 嘉慶間刻《修習止觀坐禪法要》及《大悲懺》，李氏又有捐助。

26人)，均可見張姓的重要角色，而女眷（16人）捐助者多於男性（10人）。又如《六道集》，佛弟子李寶衡捐1大員而「信女李門黃氏」捐14大員。獨力助捐的，以補刻道光本《華嚴經》〔116〕的「伍光裕堂信女魯氏」為最大額。⁸² 女信眾捐助的增加，相信與觀音殿在乾隆五十五年（1790）重修後規格、地位有所提升、逐漸吸引大批信眾燒香參拜有關。後來官方為壓制女性參與宗教活動引發的社會問題，於光緒七年（1881）立〈禁婦女入寺燒香示〉碑，警告如「仍前遊冶，托為禮懺，還願燒香」，將嚴加懲處。⁸³ 海幢文獻刊刻的最後回升期在立碑翌年迅速回落，然後終止。

至於海幢寺與書坊的關係，約占總數一成的海幢文獻由廣州書坊刊刻。嘉慶間積善堂刻《持驗》〔62〕，道光間合璧齋刻《金剛正法眼》與《華嚴寶鏡》、廣文堂刻《片雲行草》，道光前後勸善堂刻《戒殺放生文》〔105〕以及光緒間（1875-1908）潤經堂承印《綠筠堂詩草》〔141〕，刻本或書板均於寺內流通。跟寺方關係更為密切的是聚賢堂。在乾、嘉之間海幢文獻刊、藏量的頂峰期，部分典籍由位處省城學院前的聚賢堂刊刻，《書目》列出9種。這些書以普及於社會大眾的佛經、懺法類著作、僧侶著作和傳記、善書等為主，特點是卷數少、篇幅短而銷量大（或讀者多），適合由書坊刊印。從刻書量而言，聚賢堂分擔了這段期間約半數的海幢文獻。⁸⁴ 聚賢堂又曾助刻《大悲懺》，與海幢寺是互助的合作關係。

與省內外佛教同道的聯繫，是海幢文獻刊、藏事業的另一重要面。嶺南博山下道獨及道丘（1586-1658）二法系中，華首系所據法席及於廣東、

82 伍光裕堂為嘉慶以後廣州經銷洋貨紳商，參陳曙風，〈廣州西關文瀾書院的紳商活動〉，廣州市政協門戶網站「廣州文史」專欄，http://www.gzzxws.gov.cn/qxws/lwxs/lwzj/lwd_2/201011/t20101125_19766.htm（2021.3.16 上網檢索）。

83 盧敏智，〈清代海幢寺觀音殿初探〉，《神州民俗》2014.14(2014.7): 27-31。碑文載於釋新成，《海幢寺春秋》，頁122。類似的禁令屢見於清代，而官方往往傾向制訂較溫和但可實現的目標，參 Vincent Goossaert, "Irrepressible Female Piety: Late Imperial Bans on Women Visiting Temples," *Nan Nü* 10, no. 2 (January 2008): 212-41.

84 以1795年為例，海幢文獻刊刻總數及聚賢堂代刻總數比例為3:2；其餘年份的比例為：1797年（4:1）、1800年（2:1）、1801年（2:1）、1803年（1:1）、1805年（1:1）、1808年（2:1）、1810年（2:1）。

江西和福建等地，嶺南寺院如華首台、海幢、別傳、光孝、海雲、開元諸寺及東莞芥庵等，廬山的棲賢、歸宗兩寺以及福州長慶寺等，都處於通都大邑或交通要道、名山勝區，影響力較大。⁸⁵ 跟前述待時、待人刻書的做法不同，海幢寺僧或經坊對於有特殊價值或需要的佛經，會主動刊刻或重刻，如「知見錄」所標示，超過八成是重刻舊籍。其中，《初參要訣》〔86〕原板藏於杭州靈隱寺經房，海幢寺據之翻刻，刻成而新板存於刷印房。《八識規矩頌略說》書板亦藏於江外，默持捐資翻刻於海幢寺以廣通流。⁸⁶ 謝輝注意到海幢文獻有依《嘉興藏》板式翻刻，陳玉女亦說明《嘉興藏》的刊印、流通與海幢寺有密切關係；這主要是指寺僧將祖師輩的著作交嘉興楞嚴寺收入《嘉興藏》，以光宗門並廣流通。⁸⁷ 其中，函旻疏釋的《心印》刻於康熙三年（1664），板藏芥菴，後歸海幢寺。康熙三十年（1691），寺僧今辯（1637-1695）取此書與函旻的《楞嚴經直指》刻板同請入《嘉興藏》。至雍正元年（1723），華首台常住捐資將二書就海幢寺重刻，海幢常住助其工食，翌年工竣而書板藏於經坊，「于是廣州梵刹復得二疏，流通法侶，咸為抱喜云云」，⁸⁸ 可見海幢寺刻書之有益於地區同道甚廣。

華首台與海雲、開元、大佛諸寺等跟海幢寺既屬同一法系，關係密切，故有共同刻書之舉，前述的《心印》、《直指》、《金剛直說》等即其例子。至遲從道光後期起，這個趨勢越見明顯，海幢寺形成以廣州為內圈、以廣東為外圈的佛寺和禪侶的助刻網絡，而穎勤逐步成為主導人物。重刻《光宣臺集》及《梁皇懺》，穎勤已有捐資。《清規》之重刻，穎勤為撰序

85 李福標，〈從明末清初嶺南僧人文集看華首系的律學成就與傳戒活動〉，《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35.2(2021.3): 31。

86 清·默持，〈翻刻《八識規矩頌略說》〉，《八識規矩頌略說》，頁1上-下。

87 謝輝，〈刻經述略〉：177、180-181。陳玉女，〈明清嘉興楞嚴寺《嘉興藏》之刊印與其海內外流通〉，《佛光學報》新6.1(2020.1): 123-204；又參其「明清《嘉興藏》的刊刻與流通——嘉興楞嚴寺與廣州海幢寺」演講，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網站，http://mingching.sinica.edu.tw/mingchingadminweb/SysModule/mvc/friendly_print.aspx?id=915（2021.6.10上網檢索）及楊玉良，〈故宮博物院藏《嘉興藏》初探〉，《故宮博物院院刊》1997.3(1997.8): 23。

88 清·函金，〈識語〉，《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心印》，卷4下，頁52上。

文，自言於咸豐間得讀是書的西湖瑪瑙寺刻本，認為「乃近代最合時宜」之作，有助僧侶守持戒律，惜刻本殘缺，又聞其舊板於西湖經兵燹之餘已毀，故急欲重刊以廣流通。後得華林寺曠閒相助，募得各方禪侶助資。曠閒跋文強調讀此書可了然於「緇流之儀軌」，有助思考進德踐履的工夫：

談空說法，佛教也。然不先從真實處做工夫，則進德無門，將來何從了悟？故有其道，必有其事。《清規》中皆事也，即功行也。果能踐履篤實，既可以超凡入聖，抑亦無負出世修持。⁸⁹

華首系於佛門戒律的重視不亞於道丘的鼎湖系，而海幢寺處於鬧市，寺僧尤需戒律約束。⁹⁰ 海幢文獻有若干戒律儀軌類著作，古雲即輯有《沙門日用錄》〔18〕。《清規》由杭州真寂寺僧儀潤加上證義，刊於道光三年，而穎勤刻本由南海顏熏校正。與同治十年（1871）杭州海潮寺僧普照所翻原刻本相比，顏校本更可信賴。⁹¹

海幢寺本《清規》還具有重要史料價值，書中所載「廣州諸山常住暨各禪侶捐資重刻」名單，有助了解晚清以廣州為中心的佛教刻書事業的具體情況。助刻的常住，包括廣州及鄰近地區的光孝、六榕、長壽、華林、大佛、永勝、大通、海幢、飛來、寶林、雷峰、東湖、隱泉、崇勝、鷺峯、壽世、慶雲諸寺及石公西院、梅庵、羅浮（山）、法華堂及智月堂 22 處。「禪侶」助刻的，有大佛（10 人）、光孝（3）、東湖（3）、長壽（7）、海雲（8）、海幢（26）、華林（14）、華首（1）、鼎湖（8）、鳳山（1）、寶林（1）諸寺及梅庵（1）、祇園（1）84 人，穎勤亦有助銀，募得海幢文獻所見最大筆集資。其中，不論金額還是捐助人數，均以海幢、華林及慶雲三寺為大宗。穎勤於書刻成後，以餘資續刻《准提會釋》；⁹² 至光緒十

89 清·曠閒，〈跋〉，《百丈叢林清規證義記》，卷首，頁 6 上。

90 李福標，〈從明末清初嶺南僧人文集看華首系的律學成就與傳戒活動〉：33-35。

91 筆者所見海潮寺本為莊士頓（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 1874-1938）舊物，現藏倫敦大學亞非學院。

92 清·曠閒、穎勤，〈識語〉，《百丈叢林清規證義記》。《准提會釋》指《七俱胝佛母所說準提陀羅尼經會釋》。如實有其事，穎勤所刻書又添一種。

年（1884），又為李欣榮《寸心草堂文鈔》〔138〕題識語。⁹³ 由道光末至此約 40 年，穎勤苦心經營刻書事業，獨力捐資修刻海幢文獻 7 種、助刻 4 種，可謂刻書事業的殿軍。

六、海幢寺與中西文化交流

近人陳玉女提出「港口佛寺」的概念考察佛教的域外傳播，並舉楞嚴、海幢和慶雲三寺為例說明漢文佛典如何從海陸路輸出，⁹⁴ 所論甚是。以「知見錄」為據而從清代廣州的歷史發展分析，在一口通商以前（清初-1757），刊、藏的海幢文獻 33 種；一口通商時期（1758-1842）63 種（連同未能確定年份的著作，清初至 1842 年約為 120 種），而此後 20 餘種。這些文獻的刊刻流通，得益的不僅是中國佛教界，近至東亞、遠至歐洲，不少佛寺或圖書館都有藏本，見證中外文化交流。

一口通商時代，海幢寺是唯一獲官方認可接待西方人的佛寺，這個任務為寺僧帶來一種特殊收益。其時廣州商業貿易快速發展、海幢文獻的刊、藏事業進入全盛期，而僧侶合力捐資參與刻書事業的趨向更為明顯，這三者之間的關係值得注意。寺僧既以個人名義助刻書，這表示他們擁有個人財產。十九世紀不同時期的西方訪客都記載寺僧擁有私產，可用於死後土葬，⁹⁵ 當然也可用於刻書。在乾隆二十七年（1762）起 17 項有寺僧捐資額可查的紀錄中，14 項是以西洋「（銀）員」或洋員加上本地貨幣計算，這也提醒我們要注意時代的因素。海幢寺僧侶不乏收到洋銀的機會。據馬禮遜所言，年青僧侶在接待西方訪客時可以收到半員至一員、包含導賞服務和茶點的小費；⁹⁶ 在寺內發售的書籍和法事儀式用品，相信西方訪

93 清·曠閒等，〈識語〉，《寸心草堂文鈔》，頁 33 下。

94 參陳玉女，「明清港口佛寺與佛教的海外移植——從《嘉興藏》流通談起」演講，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網站，http://mingching.sinica.edu.tw/mingchingadminweb/SysModule/mvc/friendly_print.aspx?id=963（2021.7.20 上網檢索）。

95 Ljungstedt, *An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Portuguese Settlements in China*, 266; Herbert Allen Giles, *Historic China and Other Sketches* (London: Thos. De La Rue and Co., 1882), 10.

96 Robert Morrison, journal, 25 September 1807, collected in the Council for World Mission

客也是以銀員購買，這提供了數額雖小但長期的洋銀來源。西方訪客幾乎一致對經坊的設施和營運給予好評，稱讚它由具規模的圖書館（library）和印刷坊（printing office）組成，地方寬敞、光線充足、大量木刻板獲小心保存而排列有序、印刷事業在持續進行而顯出效率。⁹⁷ 入清以後楞嚴寺倚靠刊刻《嘉興藏》經書幫補寺院及僧侶開支，最後因資金不足導致刻經事業走向式微；海幢寺經坊經營的成功，適與此為一強烈對照。

就目前所知，歐洲所藏海幢文獻種類之多為全球各洲之冠，藏品數量的前三位依次為法圖、亞非學院、巴圖與柏圖。亞非學院的藏品主要指馬禮遜藏書，共 91 種；巴圖與柏圖的藏品主要來自 1830-1831 年間德國東方學家紐曼（Karl Friedrich Neumann, 1798-1870）在廣州的採購，目前分別發現 55 種及 9 種；法圖的藏品共 93 種，來源不明，主要入藏於法王菲利普一世（Louis-Philippe I, 1773-1850, r. 1830-1848）在位期間。這三批海幢文獻見證了海幢寺刊刻、流通佛教文獻事業的全盛期，以及 1820-1850 年代歐洲所藏漢文佛教文獻的快速增長期。馬禮遜與紐曼的貢獻，不僅在於豐富了歐洲的佛教文獻典藏，還在於他們在著作中推動西方對中國佛教的認識。他們對佛教的認識，主要來自閱讀海幢文獻、對該寺的觀察和與寺僧接觸；他們的著作和論說，又影響不同背景的西方讀者。筆者的最新研究顯示，馬禮遜閱讀海幢文獻時，會將重要的字詞句或內容加上記號、簡評或解說，用為編寫其《華英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的原材料，而該字典的出版，又影響同時代和往後學習中文的西方人。紐曼長期從事東方學研究和教育工作，曾將購得的《（重刊）沙彌律儀要略增註》〔36〕譯為英語及德語；他對佛教的戒律修行尤感興趣，有後續的論著出版。⁹⁸ 五口通商以後，更多西方訪客以個人、宗教或學術團體（如倫敦傳道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英國皇家亞

Archives. China, General (Zug, Switzerland: Inter Documentation Co., 1978).

97 John Henry Gray, *Walks in the City of Canton* (Hong Kong: De Souza and Co., 1875), 62; William C. Hunter, *Bits of Old China*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and Co., 1885), 176, 216.

98 本段所論參拙稿，Yeung Man Shun, “Sightseeing, Recreation, Religion, and Literature: The Role of Canton’s Haichuang Buddhist Temple in China-West Relations, 1750-1900,” *Ming Qing Studies* 2021 (November 2021): 151-200.

洲學會「Royal Asiatic Society」) 的名義購藏海幢文獻；儘管數量不大，卻收有一些稀有著作或版本，如莊士頓舊藏《華嚴經》〔128〕、牛津大學博得利 (Bodleian) 圖書館所藏《太陽尊經》〔118〕均是。

反過來說，海幢僧侶在增進西方民眾對中國佛教的認識上有何貢獻？這幾乎是沒有探討過的問題，以下從美國費城商人鄧恩 (Nathan Dunn, 1782-1844) 展出所藏中國展品談起。鄧恩從 1818 年起長期在廣州從事貿易，1831 年返國時將收集所得的文物運走，⁹⁹ 後來在費城 (1838-1841) 和倫敦 (1842-1846) 舉辦題為「萬唐人物」的展覽會。兩地的展覽會，分別吸引超過 10 萬遊客，獲英、法兩國王室成員觀賞。¹⁰⁰ 這批展品與海幢寺有兩種關係。

費城展覽會的導賞冊有兩種。一種由策展人蘭登 (William B. Langdon) 編寫，於以下展品均指出以「〔the〕 temple at Honan (筆者按：河南廟指海幢寺)」為依據：「941. 河南廟的內部，有僧侶在拜佛……1000. 通往河南廟的第一通道……1062. 佛教高僧在河南廟主持 (儀式)。」另一種由懷斯 (Enoch Cobb Wines, 1806-1879) 編寫，在〈簡介〉第 8 項「河南之圖」，他提到「這個村莊主要以其規模宏大而壯麗的佛寺聞名，那是在帝國這一地區最富有的宗教場所。」在介紹第 31 號展櫃時，他說明很多畫作都出自中國內地名人之手，而河南廟一位高僧與廣州的名人也參與其中。¹⁰¹

倫敦展覽會的展品編排與費城的不同，蘭登編寫的導賞冊有足本及

99 Jonathan Goldstein, "Nathan Dunn (1782-1844) as Anti-Opium China Trader and Sino-Western Cultural Intermediary," in *The Private Side of the Canton Trade, 1700-1840: Beyond the Companies*, ed. Paul A. Van Dyke and Susan E. Schopp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8), 95-106.

100 Ibid., 108; John R. Haddad, *The Romance of China: Excursions to China in U.S. Culture, 1776-1876*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8), 118.

101 William B. Langdon, "Ten Thousand Chinese Things." *A Descriptive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Collection, in Philadelphia. With Miscellaneous Remarks upon the Manners, Customs, Trade, and Government of the Celestial Empire* (Philadelphia, 1839), 85, 87, 89; Enoch Cobb Wines, *A Peep at China in Mr. Dunn's Chinese Collection; With Miscellaneous Notices Relating to the Institutions and Customs of the Chinese, and Our Commercial Intercourse with Them* (Philadelphia, 1839), 26, 80-81.

簡要本兩種。¹⁰² 導賞冊〈導論〉簡述中國的佛寺及偶像崇拜、解釋三寶佛時，說明這是河南廟（Honan Jos-house）的神靈。於 1185、1191、1200、1209 及 1220 號展品，導賞冊亦指出是以海幢寺為建造模型。導賞冊的介紹不限於建築特點。好像對第 1191 號展品的說明，附有長段文字，介紹該寺位處鬧市而寺內寧謐的氣氛、氣勢攝人的佛像、眾多在誦經的僧侶等。於第 1078 號展品，除了說明它是飼養放生動物之所，還說明放生的宗教含義。展櫃 7 以送贈卡（Complimentary Card）為主題，而懸掛於櫃背的卡片「由河南海幢寺的大和尚（原注：住持）贈送」，「顯示出崇敬和尊重之意」。¹⁰³ 協助鄧恩搜集文物的，包括其友伍德（William W. Wood, 1805-1855）、大行商如伍秉鑒（1769-1843）和小商人「Tingqua」等，¹⁰⁴ 而上述的住持也提供一大助力。展櫃 60 以「河南廟的大和尚或住持」為題，展品 1032 號題為「大和尚的肖像」，明言所畫的是「Hae-chwang sze」住持。導賞冊於此再加說明：

102 宮宏宇，〈廣州洋商與中西文化交流——南森·鄧恩（Nathan Dunn）「萬唐人物」中的中國樂器及其在英美的展示（1838-1846）〉，《星海音樂學院學報》2012.4(2012.12): 154。倫敦展覽會導賞冊有 1843 及 1844 年版本，介紹佛教、海幢寺的內容與 1842 年版的相近。

103 以上內容，足本參 William B. Langdon, *Ten Thousand Things Relating to China and the Chinese: An Epitome of the Genius, Government, History, Literature, Agriculture, Arts, Trade, Manners, Customs, and Social Life of the People of the Celestial Empire, Together with a Synopsis of the Chinese Collection* (London, 1842), 28-33, 100, 200, 212, 224-29, 234; 簡要本參 William B. Langdon, "Ten Thousand Chinese Things." *A Descriptive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Collection, Now Exhibiting at St. George's Place, Hyde Park Corner, London, with Condensed Accounts of the Genius, Government, History, Literature, Agriculture, Arts, Trade, Manners, Customs and Social Life of the People of the Celestial Empire* (London, 1842), 12-14, 44, 81-82, 85, 87, 89, 128-31, 135.

104 John R. Haddad, "China of the American Imagination: The Influence of Trade on US Portrayals of China, 1820 to 1850," in *Narratives of Free Trade: The Commercial Cultures of Early US-China Relations*, ed. Kendall Johnson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2), 73. 伍德的介紹，參 William W. Wood, *Sketches of China: With Illustrations from Original Drawings* (Philadelphia: Carey and Lea, 1830), 85-91.

這個真正可親的住持是鄧恩的好友，通過他的影響和努力從帝國內部採購了各種各樣的珍貴標本，為這一收藏品的組成做出貢獻，眾所周知，禁止所有外國人進入內地是中國政府的獨特政策。¹⁰⁵

這位住持的社會聯繫網絡之廣，可能超出我們的想像。倫敦的展覽結束後，展品運到英國其他地方展出，而這種實物展覽一時成為風尚。1845-1847 年間，波士頓又舉辦名為「中國大觀」的展覽會，向公眾展出約 800 件展品；1847 年之後展品移往費城展出，1849 年再移往紐約。有關佛教的介紹，「中國大觀」提到海幢寺之處較少。較為重要的，是展櫃 4 說明僧人的坐像時，指出「該僧人與著名的河南廟前住持極為相似，他深受該寺的僧侶崇敬。」¹⁰⁶

上述住持的姓名沒有出現在各展覽冊中，而英國聖公會首任維多利亞教區主教施美夫（四美，George Smith, 1815-1871）音譯之為「Chaou Chung」。按馬禮遜整理的漢字拼寫法，參考海幢文獻的紀錄，此人當名為「照中」。¹⁰⁷ 照中的名字只見於重刊《長慶語錄》、《瞎堂詩集》、《千山詩集》的捐資名錄，似乎是個不起眼的角色。不過名錄中他排名第三，在

105 導賞冊足本參 Langdon, *Ten Thousand Things Relating to China and the Chinese*, 200; 簡要本參 Langdon, "Ten Thousand Chinese Things." *A Descriptive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Collection, Now Exhibiting at St. George's Place*, 114.

106 John R. Peters, Jr., *Guide to, or Descriptive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Museum, in the Marlboro' Chapel, Boston, with Miscellaneous Remarks upon the Government, History, Religions, Literature, Agriculture, Arts, Trades,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Chinese* (Boston: Eastburn's Press, 1845), 42-43, 135-38; John R. Peters, Jr., *Miscellaneous Remarks upon the Government, History, Religions, Literature, Agriculture, Arts, Trade,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Chinese: As Suggested by an Examination of the Articles Comprising the Chinese Museum* (Philadelphia: G. B. Zieber and Co., 1847), 46-47, 169-72. 兩冊相關內容基本相同。

107 George Smith, "Second Visit of Mr. Smith to Canton," *The Herald of the Churches; or, Monthly Record of Ecclesiastical and Missionary Intelligence* 2 (April 1846): 74; Robert Morrison, *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ree Parts, Part II Vol.1* (Macao: East India Company's Press, 1819), 24, 110. 兩個拼音均代表多個漢字，但其他組合未能在海幢文獻找到相應名字。

相柱後而在相益前，應該屬同輩而地位頗高者。《語錄》《詩集》的重刻，與幾個展覽會舉辦的時期相約。透過施美夫的記述，我們才知道照中也是以送贈佛教文獻來回謝施美夫給他借閱基督教書冊。佛教僧侶雖然對這些書冊感興趣，但是沒有多少人最後會改宗基督教。¹⁰⁸

長期以來，西方社會對中國佛教的認識，主要來自外銷畫和工藝品、少數到過中國的傳教士、商人、外交家、旅遊者等的著作，以及西方報刊的零星介紹。透過上述延續十年以上的幾次展覽，西方民眾可以近距離觀賞跟佛教有關的各種展品，對他們了解「真實的」中國有一定影響，而展覽會也讓海幢寺廣為他們所認識。五口通商以後，來華的西方人仍然對該寺有著濃厚的參訪興趣，展覽會的推廣發揮重要作用。照中為展覽會所作貢獻、展覽會以海幢寺為中國佛寺的代表，這兩點是毫無疑問的。

七、結語：多面相的海幢寺歷史

以上，在鳥瞰海幢文獻的特點和價值後，本文從經僧群體的發展、刻書事業與文網的關係、捐助群體的參與和貢獻、寺僧和文獻在中西交流的作用，展現跟詩僧、文學創作相連但又相異的海幢寺歷史。具規模而長期延續的文獻刊、藏事業，是該寺有別於廣東絕大部分其他佛寺的一大特點。海幢文獻透過不同途徑在區內外以至國外流布，考察它們的刊、藏歷史，是了解世界各圖書館、宗教和學術組織相關藏品的特點和價值的必經之路。筆者相信仍會有一定數量的海幢文獻未為人注意，有待收集和整理，進一步完善我們對這個課題的認識。如本文所論述，有關這批文獻的編、刊、藏，僧侶和捐助者的連繫等重要資訊，大部分都不能從其他途徑得知。捨此文獻，即無由重建以書與人為主線的海幢寺史。

經僧與詩僧之不同，在於後者要有高水平文學修養，又與官紳文士有創作活動，人數少卻廣受注意，前者則人數雖多但事蹟多難以詳究。然而，正是這批學界沒有足夠認識的僧侶，支撐起海幢寺兩百多年間推廣佛

108 Smith, *A Narrative of an Exploratory Visit to Each of the Consular Cities of China*, 31, 101-2.

教文獻的事業。經僧與詩僧的研究相輔相成，不可偏廢；不論是對這兩個群體還是僧侶其他活動的研究，建構寺僧系譜是奠基工作；有了這個基礎，才能呈現以寺僧為本的多面相歷史。參與捐助的方式、次數、捐資名單的排輩先後、捐助金額等史料都告訴我們，在注意華首台系僧侶的同時，也要注意其他法系的貢獻。海幢文獻的刊刻流布既是佛法流通的重要媒介，而編、刊、藏這些文獻也是寺僧與禪侶、世俗的連繫點。透過對捐助者的身分、性別、籍貫等方面進行分析，可見該寺跟明清時代不少參與宗教出版事業的地區佛寺相似，作出貢獻的不僅是寺僧，還有地區內外的佛寺、同道、居士和一般善信。

海幢寺逐步發展成為中西文化交流的標誌性場所，大約始於傳、心字輩之時。如何面對西方訪客尤其基督教傳教士的活動，是自此起各代僧侶面對異於祖師輩的挑戰。面對這個挑戰，早在馬禮遜來訪之始，相字輩僧相潤等已跟他展開宗教對話，而贈讀佛教文獻是回應傳教士派發基督教書刊的對策之一，這也成就了海幢文獻的西傳。照中為鄧恩的展覽會籌集文物，大有助於西方民眾對中國和中國佛教的第一身認識，也鞏固了海幢寺作為中國佛寺代表的地位。當然，寺僧面對的挑戰不僅來自外來宗教，還曾捲入清廷禁燬書的風潮。在禁書高峰期寺方的小心應對，要透過對比海幢文獻的版本和內容始能得其原委。至於以重刊祖師輩著作來重振宗風，這為刻書事業賦予了一層時代和歷史意義。這些過往不受注意的僧侶怎樣參與這項事業和其他活動，這些活動之間有怎樣的連繫，海幢文獻在中西方接觸中還起著其他甚麼作用等，凡此，均須結合中西史料來探究闡釋，還有待今後學界的努力。

海幢寺的歷史是清代廣東佛教發展史的構成部分。冼玉清（1895-1965）的《廣東釋道著述考》，突顯以文獻著述為本論述釋道生平、地區宗教發展的可能性和重要性。韓書瑞（Susan Naquin）認為回應社會的需求和滿足參訪者的期望，是寺院在面對資源競爭時最有效的生存策略。¹⁰⁹單從刊、藏佛教文獻事業而言，目前主要看到海幢寺跟地區內外佛寺合作的一

109 Susan Naquin, *Peking: Temples and City Life, 1400-190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81.

面，因為這對各參與方都有利。尤其地區內沒有經坊或印刷坊設施的寺庵，只能倚靠海幢寺的刻書事業提供所需佛教文獻。要由僧侶而寺院、串連起寺院之間印刷事業的連繫網絡，就不能滿足於只論述海幢文獻，還應該考察海幢僧侶怎樣參與其他寺院的刻書活動。繼續以文獻著述為主線，接連環繞海幢寺刻書事業的省內外其他佛寺，並探尋佛教文獻在境內外流通的各種渠道，將會為我們對廣東佛寺和佛教文獻事業的發展歷史帶來不一樣的認識。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清·田明曜等修，陳澧纂，《（光緒）香山縣志》，《廣州大典》第 297 冊，廣州：廣州出版社，2015。

清·宋廣業纂輯，《羅浮山志會編》，《故宮珍本叢刊》第 263 冊，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

清·阮元編，《學海堂集·初集》，《廣州大典》第 512 冊，廣州：廣州出版社，2015。

清·姚觀元編，《清代禁毀書目四種》，《續修四庫全書》第 921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清·馬元著，釋真樸重修，《（重修）曹溪通志》，《中國佛寺史志彙刊》第 2 輯，臺北：明文書局，1980。

清·馬齊、朱軾等纂修，《清聖祖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1987。

清·梁恭辰，《楹聯四話》，收入白化文等編，《聯話叢編》第 4 冊，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

清·梁鼎芬等修，丁仁長等纂，《（宣統）番禺縣續志》，《廣州大典》第 279 冊，廣州：廣州出版社，2015。

清·郭汝誠修，馮奉初纂，《（咸豐）順德縣志》，《廣州大典》第 283 冊，廣州：廣州出版社，2015。

清·陳志儀修，胡定纂，《（乾隆）順德縣志》，《廣州大典》第 282 冊，廣州：廣州出版社，2015。

清·陸向榮修，劉彬華纂，《（道光）陽山縣志》，道光三年（1823）刻本。

清·劉芳纂修，《（乾隆）新興縣志》，民國二十三年（1934）鉛印本。

清·暴煜修，李卓揆纂，《（乾隆）香山縣志》，《中山文獻》第 28 冊，廣州：廣東人

民出版社，2017。

清·戴肇辰修，史澄纂，《（光緒）廣州府志》，《廣州大典》第268-271冊，廣州：廣州出版社，2015。

清·韓祐纂修，《（康熙）儋州志》，《故宮珍本叢刊》第193冊，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

清·釋今釋著，釋古理、釋古習編，《徧行堂集》，《清代詩文集彙編》第46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清·釋今無，《阿字無禪師光宣臺集》，《廣州大典》第439冊，廣州：廣州出版社，2015。

清·釋弘贊註，《滄山警策句釋記》，《廣州大典》第411冊，廣州：廣州出版社，2015。

清·釋成鷲，《咸陟堂集》，道光二十五年（1845）重刻本。

清·釋函昱，《瞎堂詩集》，《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116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清·釋函昱著，李福標、仇江點校，《瞎堂詩集》，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6。

清·釋函昱，《瞎堂詩集》，《清代詩文集彙編》第27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周之貞、馮葆熙修，周朝槐纂，《（民國）順德縣志》，《廣州大典》第284冊，廣州：廣州出版社，2015。

* 以下為註解中引錄「知見錄」的海幢文獻：

清·道獨，《華嚴寶鏡》，1656。

清·道獨，《龍舒淨土文》，1658。

清·劉承業等刻，《大乘妙法蓮華經》，1670。

清·古松，《四分比丘尼戒本》，1678。

清·曾光達，《法界安立圖》，1679。

清·古松，《大方廣圓覺修多羅義經》，1680。

清·陳際臨，《六祖大師法寶壇經》，1695。

清·傳庸、心寧、心一，《（請）諸天科儀》，1710。

清·傳庸、心寧、心一，《金光明經》，1710。

清·梁應舉刻，《禪門日誦》，1723。

清·函金，《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心印》，1724。

清·釋今但，《觀楞伽阿跋多羅寶經記》，1724。

清·黎嘉謀，《金剛決疑解》，1733。

清·錫特庫，《天目中峰禪師垂示法語》，1751。

清·心旦，雲棲大師遺稿，1768。

- 清·心旦，《角虎集》，1770。
- 清·契和，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如義》，1787。
- 清·默持，《八識規矩頌略說》，1792。
- 清·契誠等重梓，《普照禪師修心訣》，1793。
- 清·陳維寧等刊，《歷朝金剛持驗記》，1799。
- 清·契清刻，《禪宗永嘉集》，1801。
- 清·契次，《榮根譚》，1810。
- 清·相柱，《讚本》，1815。
- 清·相種，《金剛正法眼》，1826。
- 清·相種，《華嚴寶鏡》，1826。
- 清·李孝光，《高上玉皇本行集經》，1829。
- 清·曠閒，《百丈叢林清規證義記》，1862。
- 清·曠閒等，《寸心草堂文鈔》，1884。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Report of 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Presented at the Thirty-Ninth Annual Meeting.* Boston: T. R. Marvin, 1848.

Bonney, Catharina Van Rensselaer. *A Legacy of Historical Gleanings.* Oakland: J. Munsell, 1875.

Cumming, C. F. Gordon. *Wanderings in China.* Vol. 1. Edinburgh: William Blackwood and Sons, 1886.

Giles, Herbert Allen. *Historic China and Other Sketches.* London: Thos. De La Rue and Co., 1882.

Gray, John Henry. *Walks in the City of Canton.* Hong Kong: De Souza and Co., 1875.

Gray, John Henry. *China: A History of the Laws,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People.* Vol. 1.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1878.

Hunter, William C. *Bits of Old China.*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and Co., 1885.

Langdon, William B. "Ten Thousand Chinese Things." *A Descriptive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Collection, in Philadelphia. With Miscellaneous Remarks upon the Manners, Customs, Trade, and Government of the Celestial Empire.* Philadelphia, 1839.

Langdon, William B. *Ten Thousand Things Relating to China and the Chinese: An Epitome of the Genius, Government, History, Literature, Agriculture, Arts, Trade, Manners, Customs, and Social Life of the People of the Celestial Empire, Together with a*

- Synopsis of the Chinese Collection*. London, 1842.
- Langdon, William B. "Ten Thousand Chinese Things." *A Descriptive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Collection, Now Exhibiting at St. George's Place, Hyde Park Corner, London, with Condensed Accounts of the Genius, Government, History, Literature, Agriculture, Arts, Trade, Manners, Customs and Social Life of the People of the Celestial Empire*. London, 1842.
- Ljungstedt, Anders. *An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Portuguese Settlements in China; and of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in China*. Boston: James Munroe and Co., 1836.
- Morrison, Robert. *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ree Parts*. Part II. Vol. I. Macao: East India Company's Press, 1819.
- Morrison, Robert. Journal, collected in the Council for World Mission Archives. China, General. Zug, Switzerland: Inter Documentation Co., 1978.
- Peters, John R., Jr. *Guide to, or Descriptive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Museum, in the Marlboro' Chapel, Boston, with Miscellaneous Remarks upon the Government, History, Religions, Literature, Agriculture, Arts, Trades,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Chinese*. Boston: Eastburn's Press, 1845.
- Peters, John R., Jr. *Miscellaneous Remarks upon the Government, History, Religions, Literature, Agriculture, Arts, Trade,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Chinese: As Suggested by an Examination of the Articles Comprising the Chinese Museum*. Philadelphia: G. B. Zieber and Co., 1847.
- Roberts, Edmund. *Publishing, Embassy to the Eastern Courts of Cochin-China, Siam, and Muscat; in the U. S. Sloop-of-War Peacock, David Geisinger, Commander, during the Years 1832-3-4*.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1837.
- Smith, George. "Second Visit of Mr. Smith to Canton." *The Herald of the Churches; or, Monthly Record of Ecclesiastical and Missionary Intelligence* 2 (April 1846): 74-76.
- Smith, George. *A Narrative of an Exploratory Visit to Each of the Consular Cities of China, and to the Islands of Hong Kong and Chusan: In Behalf of the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in the Years 1844, 1845, 1846*. London: Seeley, Burnside and Seeley, 1847.
- Williams, Samuel W. *The Middle Kingdom: A Survey of the Geography, Government, Education, Social Life, Arts, Religion, etc. of the Chinese Empire and Its Inhabitants*.

New York: Wiley and Putnam, 1848.

Wines, Enoch Cobb. *A Peep at China in Mr. Dunn's Chinese Collection; With Miscellaneous Notices Relating to the Institutions and Customs of the Chinese, and Our Commercial Intercourse with Them*. Philadelphia, 1839.

Wood, William W. *Sketches of China: With Illustrations from Original Drawings*. Philadelphia: Carey and Lea, 1830.

二、近人論著

(日) 大西和彥 1985 〈近世ベトナム佛教界と廣州海幢寺〉,《佛教史學研究》27.2 (1985.3): 69-94。

上海古籍出版社編 2007 《清代文字獄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 1997 《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仇 江 2004 〈清初曹洞宗丹霞法系初探〉,《廣東佛教》2004.6(2004.12): 23-31。

王小盾、王皓、黃嶺、任子田 2019 〈從越南的四所寺院看漢籍在域外的生存〉,《域外漢籍研究集刊》18(2019.6): 421-442。

王元林、陳芸 2018 〈清代中後期廣州海幢寺的對外開放與中外宗教文化交流〉,《世界宗教文化》2018.6(2018.12): 40-45。

王汎森 2015 《權力的毛細血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王宏斌 2015 《清代價值尺度:貨幣比價研究》,北京:三聯書店。

王美偉 2012 「明末清初嶺南士僧交遊與文學」,重慶:西南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碩士學位論文。

王域鉞 2020 「法國國家圖書館古恒《中文、朝鮮文、日文等書籍目錄》及著錄漢籍研究」,濟南:山東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博士學位論文。

吳哲夫 1969 《清代禁燬書目研究》,臺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

吳哲夫 1990 《四庫全書纂修之研究》,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李舜臣 2008 《嶺外別傳:清初嶺南詩僧群研究》,廣州:南方日報出版社。

李福標 2021 〈從明末清初嶺南僧人文集看華首系的律學成就與傳戒活動〉,《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35.2(2021.3): 30-36。

汪宗衍 1986 《明末天然和尚年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 洗玉清 2016 《廣東釋道著述考》，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 （日）岡本さえ 1996 《清代禁書の研究》，東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
- 林子雄 2002 〈古代廣東佛教文獻的印刷出版及其影響〉，收入趙春晨主編，《嶺南宗教歷史文化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頁 134-144。
- 姜伯勤 1999 《石濂大汕與澳門禪史：清初嶺南禪學史研究初編》，上海：學林出版社。
- 宮宏宇 2012 〈廣州洋商與中西文化交流——南森·鄧恩（Nathan Dunn）「萬唐人物」中的中國樂器及其在英美的展示（1838-1846）〉，《星海音樂學院學報》2012.4(2012.12): 151-158。
- 張玉興 1999 〈奇人奇遇奇詩奇語——評釋函可及其《千山詩集》與《千山語錄》〉，收入何修齡、朱憲、趙放編，《四庫禁毀書研究》，北京：北京出版社，頁 211-231。
- 張紅、仇江 2010 〈曹洞宗番禺雷峰天然和尚法系初稿〉，收入楊權主編，《天然之光——紀念函詒禪師誕辰四百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頁 6-53。
- 張捷夫 1999 〈屈大均及其著作的厄運〉，收入何修齡、朱憲、趙放編，《四庫禁毀書研究》，北京：北京出版社，頁 181-199。
- 張啟龍、徐哲 2015 〈被動的主動：清末廣州高第街婦女權利與地位研究——以契約文書為例〉，《婦女研究論叢》2015.2(2015.3): 96-105。
- 張淑瓊 2012 〈清代廣州海幢寺經坊刻書及藏版述略〉，《嶺南文史》2012.2(2012.6): 52-55。
- 張龍平 2018 〈清代中後期來華西方人的海幢寺印象與宗教文化觀念〉，《澳門研究》89(2018.6): 70-82。
- 曹剛華 2018 《清代佛教史籍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
- 郭林林 2020 〈海幢寺與清代廣州文人文化活動研究〉，《嶺南文史》2020.1(2020.3): 21-28。
- 陳玉女 2020 〈明清嘉興楞嚴寺《嘉興藏》之刊印與其海內外流通〉，《佛光學報》新 6.1(2020.1): 123-204。
- 陳玉女 2020 「明清《嘉興藏》的刊刻與流通——嘉興楞嚴寺與廣州海幢寺」，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網站 <http://mingching.sinica.edu.tw/mingching>

- adminweb/SysModule/mvc/friendly_print.aspx?id=915 (2021.6.10 上網檢索)。
- 陳玉女 2021 「明清港口佛寺與佛教的海外移植——從《嘉興藏》流通談起」，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網站，http://mingching.sinica.edu.tw/mingchingadminweb/SysModule/mvc/friendly_print.aspx?id=963 (2021.7.20 上網檢索)。
- 陳恒新 2018 「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漢籍研究」，濟南：山東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博士學位論文。
- 陳曙風 1990 〈廣州西關文瀾書院的紳商活動〉，廣州市政協門戶網站「廣州文史」專欄，http://www.gzzxws.gov.cn/qxws/lwzs/lwzj/lwd_2/201011/t20101125_19766.htm (2021.3.16 上網檢索)。
- 楊文信 2007 〈1840 年代中、美關係史料拾零——敬林與邦尼致顧盛函箋釋〉，《明清史集刊》9(2007.9): 263-284。
- 楊文信 2014 〈從「三教合一」到「人間佛教」——論《佛光榮根譚》對《榮根譚》的傳承與發展〉，收入程恭讓、釋妙凡主編，《2014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理論實踐研究（上）》，高雄：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頁 796-816。
- 楊文信 2018 〈薈萃中西·多元功能——論重構清朝中後期海幢寺歷史的起點〉，收入釋新成、釋光秀主編，《海外文獻與海幢寺文化研究》，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頁 173-193。
- 楊玉良 1997 〈故宮博物院藏《嘉興藏》初探〉，《故宮博物院院刊》1997.3 (1997.8): 13-24。
- 楊 健 2008 《清王朝佛教事務管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楊 權 2014 〈清初嶺南禪史研究與佛教文獻整理〉，《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31.1 (2014.1): 142-155。
- 劉 乾 1986 〈論道光年間的重刻禁書〉，《文物》1986.6(1986.6): 61-67。
- 蔡鴻生 1997 《清初嶺南佛門事略》，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
- 蔣 寅、于景祥主編 2016 《清代東北流人文獻集成》第 1 輯，瀋陽：遼海出版社。
- 鄭志良 2012 〈《紅樓夢傳奇序並題詞》考述〉，《紅樓夢學刊》2012.3 (2012.6): 209-224。
- 盧敏智 2014 〈清代海幢寺觀音殿初探〉，《神州民俗》2014.14(2014.7): 24-34。
- 謝 輝 2017 〈德國巴伐利亞州立圖書館藏清代海幢寺刻經述略〉，《國際漢學》11 (2017.6): 177-182。

- 簡瑞瑤 2016 〈明清之際粵東佛教的親眷型態——兼論女性出家〉，《玄奘佛學研究》25(2016.3): 1-33。
- 嚴旒萍、吳天躍 2020 〈收藏、翻譯與藝術趣味：西班牙人阿格特與清代海幢寺外銷組畫〉，《文藝研究》2020.9(2020.9): 146-160。
- 蘇 精 2000 《馬禮遜與中文印刷出版》，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 釋新成 2008 《海幢寺春秋》，廣州：花城出版社。
- (日) 櫻井由躬雄 1979 〈在泰京越南寺院景福寺所藏漢籍字喃本目錄〉，《東南アジア—歴史と文化—》8(1979.4): 73-117。
- Clart, Philip, and Gregory Adam Scott, eds. *Religious Publishing and Print Culture in Modern China: 1800-2012*. Berlin: De Gruyter, 2015.
- Goldstein, Jonathan. "Nathan Dunn (1782-1844) as Anti-Opium China Trader and Sino-Western Cultural Intermediary." In *The Private Side of the Canton Trade, 1700-1840: Beyond the Companies*, edited by Paul A. Van Dyke and Susan E. Schopp, 95-114.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8.
- Goossaert, Vincent. "Irrepressible Female Piety: Late Imperial Bans on Women Visiting Temples." *Nan Nü* 10, no. 2 (January 2008): 212-41.
- Guy, R. Kent. *The Emperor's Four Treasuries: Scholars and the State in the Late Ch'ien-Lung Era*. Cambridge, MA: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87.
- Haddad, John R. *The Romance of China: Excursions to China in U.S. Culture, 1776-1876*.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8.
- Haddad, John R. "China of the American Imagination: The Influence of Trade on US Portrayals of China, 1820 to 1850." In *Narratives of Free Trade: The Commercial Cultures of Early US-China Relations*, edited by Kendall Johnson, 57-82.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2.
- Naquin, Susan. *Peking: Temples and City Life, 1400-1900*.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 Sieber, Patricia. "The Jinguqiguan 今古奇觀 (*Extraordinary Sights, Old and New*, ca. 1640), the Haichuang Temple's Cult of the Book, and the Representation of Buddhist Practice in Europe." Unpublished working paper, 1-44.
- Van Dyke, Paul A. "Smuggling Networks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before 1842: Implications

- for Macau and the American China Trade.” In *Americans and Macao: Trade, Smuggling, and Diplomacy on the South China Coast*, edited by Paul A. Van Dyke, 49-72.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2.
- West, Andrew C. *Catalogue of the Morrison Collection of Chinese Books*. London: 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 1998.
- Xu Yan 徐豔, and Michael Lackner. *Die Bücher des letzten Kaiserreichs: Katalog zur Ausstellung über das Leben des China-Forschers Karl Friedrich Neumann mit Exponaten aus seiner Sammlung seltener Sinica*. Erlangen: FAU University Press, 2012.
- Yeung Man Shun. “Buddhist-Christian Encounters: Robert Morrison and the Haichuang Buddhist Temple in Nineteenth-Century Canton.” In *The Church as Safe Haven: Christian Governance in China*, edited by Lars Peter Laamann and Joseph Tse-Hei Lee, 71-100. Leiden: Brill, 2018.
- Yeung Man Shun. “Sightseeing, Recreation, Religion, and Literature: The Role of Canton’s Haichuang Buddhist Temple in China-West Relations, 1750-1900.” *Ming Qing Studies 2021* (November 2021): 151-200.

附錄 海幢文獻知見錄

藏書地略稱

1. 莊士頓藏書：(RJ)、利茲大學：(Leeds)
2. 大西和彥：(大西)、櫻井由躬雄：(櫻井)
3. (徐豔)及(點校《瞎堂詩集》)：見引用書目

編號	成書／ 刻書／ 序跋時間	文獻名稱	卷數、刊刻年 份、資料出處	捐資模式	海幢寺梓 刻／板藏	備註
順治						
1	1656	華嚴寶鏡	1 卷，十三年道 獨序、今種跋刊 本(據道光六年 刻本)			書成而刊年 及刊處未詳
2	1658	龍舒淨土 文	11 卷，十五年道 獨題識語，干居 士捐資刊刻 (199)	俗	板藏	
3	1658	師子林天 如和尚淨 土或問	1 卷，十五年道 獨刻及題識語 (據乾隆二十一年 刻本)	僧	板藏	
康熙						
4	1667	佛說四十 二章經	1 卷，六年刊， 鄭時保書(174)		板藏	題「版藏廣 州府海幢禪 寺經坊流通」
5	1670	大乘妙法 蓮華經	1 冊，九年刊， 劉承業等刻(柏 圖)	俗	板藏	
6	1676	萬法歸心 錄	2 卷，十五年刻 本，羅浮堅持募 眾緣重梓(省圖)	僧俗？	板藏	

編號	成書／ 刻書／ 序跋時間	文獻名稱	卷數、刊刻年 份、資料出處	捐資模式	海幢寺梓 刻／板藏	備註
7	1678	四分比丘 尼戒本	1 卷，十七年古 松捐刻本（192）	尼	板藏	
8	1679	大佛頂如 來密因修 證了義諸 菩薩萬行 首楞嚴經	10 卷，十八年 姚今澍、胡今引 捐刻並題識語 （176）	俗	板藏	
9	1679	法界安立 圖	3 卷，十八年曾光 達題序及識語， 曾光達等捐資重 刻（193）	俗	板藏	
10	1679	慈悲道場 懺法	10 卷，十八年姚 今澍、胡今引捐 刻並題識語 （189）	俗	板藏	
11	1679	維摩詰所 說經	3 卷，十八年姚 今澍、胡今引捐 刻並題識語 （175）	俗	板藏	
12	1680	大方廣圓 覺修多羅 了義經	1 卷，十九年古松 捐資刻並題識語 （175）	尼	板藏	
13	1695	六祖大師 法寶壇經	1 卷，三十四年 陳慧對等捐資重 刻，陳際臨弁言 （200）	俗	板藏	16 佛弟子捐 資
14	1710	（請）諸 天科儀	1 卷，四十九年 傳庸等刊及題識 語（186）	尼	板藏	
15	1710	金光明經	4 卷（缺卷 3）， 四十九年傳庸等 刊（巴圖）	尼	板藏	

編號	成書／ 刻書／ 序跋時間	文獻名稱	卷數、刊刻年 份、資料出處	捐資模式	海幢寺梓 刻／板藏	備註
16	1719	佛說大乘 聖無量壽 決定光明 王如來陀 羅尼經	1 卷，五十八年 傳住刊並題識語 (176)	僧	板藏	
17	1663- 1722	洪名寶懺	1 卷，二年道霈 識語，古雲題跋 本，正岸等捐資， 心嚴重刻 (190)	僧尼	板藏	
18	1722 前	沙門日用 錄	1 卷，古雲重編， 海幢寺梓 (186)	僧	梓刻	成驚有〈挽 海幢雲庵(古 雲號)和尚〉 詩，是書之 刻當不晚於 此。
雍正						
19	1723	禪門日誦 (諸經日 誦)	1 卷，元年梁應 舉刻，心固書字 (據乾隆五十七 年增補本)	俗	板藏	
20	1724	楞伽阿跋 多羅寶經 心印	4 卷，二年海幢 寺重刻本，華首 監寺函金題識語 (182)	僧	經坊重 刻、板藏	
21	1724	觀楞伽阿 跋多羅寶 經記	4 卷，二年今但 題識語，海幢寺 重刻本 (182)	僧	經坊重刻	
22	1733	金剛決疑 解	1 卷，十一年黎 嘉謀跋，黎氏合 刻 (179)	俗	板藏	

編號	成書／ 刻書／ 序跋時間	文獻名稱	卷數、刊刻年 份、資料出處	捐資模式	海幢寺梓 刻／板藏	備註
23	1735	比丘戒本 疏義	2 卷，十三年傳 嚴輯述，傳夏捐 經坊餘資刊刻 (191)	僧	經坊梓刻	
乾隆						
24	1737 前	修設瑜伽 集要施食 壇儀（瑜 伽集要施 食儀軌）	1 卷，清初刻本 (187)		板藏	有祿宏語， 板式及刻工 異於乾隆二 年刊本。
25	1737	修設瑜伽 集要施食 壇儀	1 卷，二年傳夏 捐經坊餘資刊刻 (187)	僧	經坊梓 刻、板藏	
26	1737	梵網經心 地品菩薩 戒疏義	2 卷，二年海幢 寺梓，雷峰傳晟 輯述（182）	僧	經坊梓刻	
27	1744	禪林寶訓 筆說	3 卷，九年海幢 寺重梓康熙四十 五年智祥序刊本 (200)	僧	經坊重梓	
28	1745	（重刻水 月齋）指 月錄	32 卷，十年海 幢常住募各山師 僧捐資重梓釋弘 禮刻本（43）	僧尼	經坊重 梓、板藏	24 僧及 2 師 太捐資，雷 峰及海幢常 住各捐 10 兩。
29	1745	增集人天 眼目	2 卷，十年海幢 常住捐資並募信 士捐資重梓康熙 四十二年仁峴序 刊本（194）	僧俗	經坊重 梓、板藏	海幢常住捐 10 兩，馮常 伯、馮豐遠 各捐 2 兩。
30	1745	經懺直音 增補切釋	1 卷，十年海幢 寺重梓康熙二十 九年傳檀序校本 (205)	僧	經坊重梓	

編號	成書／ 刻書／ 序跋時間	文獻名稱	卷數、刊刻年 份、資料出處	捐資模式	海幢寺梓 刻／板藏	備註
31	1751	大乘起信 論直解	2 卷，十六年心 旦題識及校刻 (184)	僧	板藏	
32	1751	天目中峰 禪師垂示 法語	1 卷，十六年鎮 粵將軍錫特庫序 刻本 (201)		板藏	
33	1756	師子林天 如和尚淨 土或問	1 卷，二十一年 增補順治十五年 道獨刻及題識語 本，盧峰心安識 語 (199)		板藏	
34	1758	今雨堂詩 墨	2 卷，二十三年 金甡序刊本 (242)	俗	板藏	
35	1759	海幢朗如 大師語錄	3 卷，二十四年 法真自述，默演 記集刻本 (201)			
36	1762	(重刊) 沙彌律儀 要略增註	2 卷，二十七年 法一等捐資重 刻，羅浮精舍心 警撰〈重刻緣起〉 (192)	僧	板藏	20 海幢寺 僧 (法、默 輩等) 共捐 5 中員 21 員 及 1 兩 5 錢
37	1762	重梓歸元 直指集	3 卷，二十七年 海幢寺重梓流通， 唐為新序 (197)	僧	經坊重 梓、板藏	
38	1762	淨土捷要	1 卷，二十七年 海幢寺重梓具崇 禎九年識語刊本 (200)	僧	經坊重梓	

編號	成書／ 刻書／ 序跋時間	文獻名稱	卷數、刊刻年 份、資料出處	捐資模式	海幢寺梓 刻／板藏	備註
39	1764	妙法蓮華 經	7 卷，二十九年 復刻（169）	俗	板藏	無名子捐 22 兩 5 錢 5 分
40	1765	佛說阿彌 陀經疏鈔	4 卷，三十年海 幢寺重梓流通 （184）	僧	經坊重 梓、板藏	
41	1765	念佛往生 西方公據	1 卷，三十年海 幢寺重梓（據乾 隆六十年刻本）	僧	經坊重梓	
42	1766	佛說阿彌 陀經	1 卷，三十一年 梓刻（176）		板藏	
43	1768	雲棲大師 遺稿	1 卷，三十三年 心旦題重刻序， 海幢寺重梓 （202）	僧	經坊重梓	
44	1769	大方廣佛 華嚴經	80 卷，三十四年 心旦等捐刻 （169）	僧俗	板藏	海幢寺僧 22 人（心 2、法 5、默 11；其 餘 4）、大佛 常住、信士 1 信女 3 募 得 93 大員 及 106 兩 6 錢。
45	1770	角虎集	2 卷，三十五年 心旦序，法一捐 資刊刻，海幢寺 重梓（44）	僧	經坊重梓	
46	1772	金剛般若 波羅蜜經 （金剛直 說）	1 卷，三十七年 傳修、心旦捐 資重梓（180）	僧	板藏	

編號	成書／ 刻書／ 序跋時間	文獻名稱	卷數、刊刻年 份、資料出處	捐資模式	海幢寺梓 刻／板藏	備註
47	1772	維摩詰所 說經註	10 卷，三十七年 刊（RJ）		板藏	
48	1775?- 1783?	羅浮山志 會編	22 卷，約乾隆 四十年間刊本， 據康熙間宋志益 刻本（Leeds）		板藏	
49	1785	諸經日誦 集要	2 卷，五十年海 幢寺重刻本 （185）	僧	經坊梓刻	
50	1787	金剛般若 波羅蜜經 如義	1 卷，五十二年 倪珪刻本（179）	俗	板藏	
51	1792	八識規矩 頌略說	1 卷，五十七年 默持捐資翻刻並 序（194）	僧		
52	1792	佛說大阿 彌陀經	2 卷，五十七年 張元洪等梓刻 （176）	俗	板藏	
53	1792	禪門日誦	1 卷，五十七年 默持增刊雍正元 年梁應舉刻本 （185）	僧	板藏	增〈釋迦世 尊本傳〉及 〈佛教緣起〉
54	1792	楞嚴正脉	10 卷，五十七年 遂成等重梓 （Leeds）	僧俗	板藏	3 海幢寺僧 （契 1；其餘 2）、13 佛弟 子 19 女眾募 得 132 兩 4 錢 5 分；刻 工 110 兩。

編號	成書／ 刻書／ 序跋時間	文獻名稱	卷數、刊刻年 份、資料出處	捐資模式	海幢寺梓 刻／板藏	備註
55	1793	普照禪師 修心訣	1 卷，五十八年 契誠等重梓 (197)	僧俗	板藏	5 海幢寺僧 (契 1；其餘 4)、2 佛弟 子募得 3 大 員 3 中員及 2 錢 5 分。
56	1795	(妙法蓮 華經)觀 世音菩薩 普門品經	1 卷，六十年契 泉書字，黃秉清 等刻，聚賢堂刊 本(170)	俗	板藏	
57	1795	念佛往生 西方公據	1 卷，六十年默 寶等捐資重梓 (198)	僧俗	板藏	22 海幢寺僧 (心 1、默 2、 契 5、相 1； 其餘 13)、 佛弟子 3 募 得 4 大員 7 中員及 1 兩 1 中錢 22 錢。
58	1795	金剛般若 波羅蜜經	1 卷，六十年默 印刻，聚賢堂刊 本(170)	僧	板藏	
嘉慶						
59	1796	六道集	5 卷，元年默印 等重梓(202)	僧俗	板藏	15 海幢寺僧 (心 1、默 3、 契 4、相 1； 其餘 6)、佛 弟子 1 女眾 2 募得 33 大 員 3 中員。
60	1797	佛說四天王 經·佛 說八師經	各 1 卷，二年李 嘉果梓刻(174)	俗	板藏	

編號	成書／ 刻書／ 序跋時間	文獻名稱	卷數、刊刻年 份、資料出處	捐資模式	海幢寺梓 刻／板藏	備註
61	1797	金剛般若 波羅蜜經	1 卷，二年契誠 刻，黃秉忠等捐 資，聚賢堂刊本 (170)	僧俗	板藏	
62	1797	持驗	1 卷，二年積善 堂刻本 (202)		板藏	
63	1797	修習止觀 坐禪法要	1 卷，二年默持 等重梓 (194)	僧俗	板藏	5 海幢寺僧 (默 1、契 2； 其餘 2)、佛 弟子 3 募得 10 大員半 1 中員 2 錢 5 分。
64	1799	佛說阿彌 陀經要解 (靈峰蕩 益大師選 定淨土十 要卷 1)	1 卷，四年默寶 等重梓 (184)	僧	板藏	20 海幢寺僧 (心 2、默 3、 契 7；其餘 8) 募得 8 中 員 9 員及 1 中錢 7 錢 8 分。
65	1799	歷朝金剛 持驗記	2 卷，四年粵東 陳維寧等及婁東 朱嚴聖刊 (204)	俗	板藏	
66	1800	地藏菩薩 本願經	2 卷，五年契泉 手書，魯松峰 刊，聚賢堂刻 (172)	俗	板藏	
67	1800	金剛般若 波羅蜜經 論	2 卷，五年默印 刊 (180)	僧	板藏	

編號	成書／ 刻書／ 序跋時間	文獻名稱	卷數、刊刻年 份、資料出處	捐資模式	海幢寺梓 刻／板藏	備註
68	1801	蓮宗輯要	2 卷，六年朱長 至等捐資刊 (198)	俗	板藏	16 善信捐 1 中員 52 員有 餘
69	1801	禪宗永嘉 集	1 卷，六年契清 刻並書識語，聚 賢堂刊 (201)	僧	板藏	
70	1803	千手千眼 大悲心懺 (咒) (法)	1 卷，六年契泉 書、八年敬林題 錄，默寶等捐資 刻，聚賢堂刊本 (187)	僧俗	板藏	63 海幢寺僧 (心 2、默 7、契 18、 相 11；其餘 25)、佛弟 子 11 女眾 6 書坊 1 募得 10 兩 40 錢 有餘。
71	1805	藥師瑠璃 光如來本 願功德經	1 卷，十年法泉 書，劉傑遠等捐 資刊，聚賢堂刊 本 (174)	俗	板藏	
72	1807	般若無盡 藏真言・ 補闕真言 (金剛般 若波羅蜜 經)	1 卷，十二年謝 濤等捐資刊 (法 圖)	俗	板藏	
73	1808	緇門崇行 錄	1 卷，十三年王 廷蘭等重刊康熙 二十二年今辯題 刊本，聚賢堂刻 本 (43)	俗	板藏	

編號	成書／ 刻書／ 序跋時間	文獻名稱	卷數、刊刻年 份、資料出處	捐資模式	海幢寺梓 刻／板藏	備註
74	1808	解惑編	2 卷，十三年李 本、默印等捐資 重刊（巴圖）	僧俗	板藏	18 海幢寺僧 （默 3、契 9、相 5；其 餘 1）、佛弟 子一家募得 15 大員 50 員。
75	1810	金剛般若 波羅蜜經 宗通	2 卷，十五年默 印等重梓（180）	僧俗	板藏	3 海幢寺僧 （默 1、契 1； 其餘 1）、佛 弟子 3 募得 4 員及 45 兩。
76	1810	菜根譚	1 卷，十五年重 刻乾隆四十年楊 天寧序刊本，契 次重刻序，張應 振、謝孟符全刊， 聚賢堂刊本 （151）	俗	板藏	
77	1811	佛說業報 差別經・ 佛說輪轉 五道罪福 報應經・ 大阿羅漢 難提蜜多 羅所說法 住記	1 卷，十六年李 福智堂重梓（法 圖）	俗	板藏	
78	1812	佛說七俱 胝佛母心 大準提陀 羅尼經	1 卷，十七年李 福智堂刊本 （177）	俗	板藏	
79	1813	唱道真言	5 卷，十八年喻 梅校刊本（236）		板藏	

編號	成書／ 刻書／ 序跋時間	文獻名稱	卷數、刊刻年 份、資料出處	捐資模式	海幢寺梓 刻／板藏	備註
80	1815	讚本	1 卷，二十年相 柱序及識語 (186)		板藏	
81	1818	大佛頂首 楞嚴咒	1 冊，二十三年 海幢寺重刻本 (徐豔：145)	僧	經坊重梓	
82	1819	阿字無禪 師光宣臺 集	25 卷，二十四年 契清等捐資重刊 (202)	僧		海幢寺常住 捐 41 兩 7 錢 2 分、24 僧(契6、相 18)募得 53 兩 2 錢 8 分 (原捐額為 洋員)，刻工 板銀 95 兩。
道光						
83	1821	十法界循 業發現圖	1 卷軸，元年石 鳳臺書(巴圖)		板藏	
84	1823	淨土三經	4 卷，三年鐫乾 隆五十七年彭際 清重刊本，彭氏 序(175)		板藏	
85	1670- 1824 前	為山警策 句釋記	2 卷，順治十七 年鄭裔序，海幢 寺經坊重梓康熙 九年《嘉興藏》 本(195)	僧	經坊重梓	
86	1742- 1824 前	(翻刻) 初參要訣	1 卷，翻刻「乾 隆七年潮陽靈山 寺佛旨刻本」， 板藏海幢寺刷 印房(197)		板藏	

編號	成書／ 刻書／ 序跋時間	文獻名稱	卷數、刊刻年 份、資料出處	捐資模式	海幢寺梓 刻／板藏	備註
87	1824 前	老子道德 經解	2 篇，清刻本 (80)		板藏	
88	1824 前	素書註	1 卷，清刻本 (81)		板藏	
89	1824 前	佛說摩利 支天陀羅 尼經	1 卷，心總刊本 (177)	僧	板藏	
90	1824 前	金剛般若 略義(《天 目中峯和 尚廣錄》 卷 15)	1 卷，清刻本， 海幢寺南度和尚 捐資刊刻，二嚴 主人序(179)	僧	板藏	
91	1824 前	金剛般若 波羅蜜經 (金剛經 解義)	1 卷，清刻本 (181)		板藏	
92	1824 前	大方廣圓 覺修多羅 了義經直 解	2 卷，清刻本 (183)		板藏	
93	1824 前	大悲懺法 便誦	1 卷，海幢寺經 坊梓刻、流通 (188)	僧	重梓、 板藏	
94	1824 前	大方廣佛 華嚴實懺	1 卷，清刻本 (189)		板藏	
95	1824 前	慈悲十王 妙懺法	3 卷，張朝臣刻 本(189)	俗	板藏	

編號	成書／ 刻書／ 序跋時間	文獻名稱	卷數、刊刻年 份、資料出處	捐資模式	海幢寺梓 刻／板藏	備註
96	1824 前	慈悲道場 懺法	10 卷，清刻本 (189)		板藏	板式、內容 異於康熙本， 應為較後刻 本。
97	1824 前	四分戒本	1 卷，清刻本 (191)		板藏	
98	1824 前	護法論	1 卷，清刻本 (193)		板藏	
99	1824 前	萬善同歸 集	6 卷，清刻本，雍 正十一年御製序 (195)		板藏	
100	1824 前	化生儀軌	1 卷，法鳳捐資 重刊 (195-6)	僧	板藏	
101	1824 前	(重刻) 憨山大師 觀老莊影 響論	1 卷，鄭兆錡、 覺珠同梓康熙四 十七年古雲序刊 本 (196)	僧俗	板藏	
102	1824 前	海幢阿字 無禪師語 錄	2 卷，今辯重編， 古雲述〈海幢阿 字無禪師行狀〉， 清刻本 (201)			大西：85 載 為「海幢寺 經坊本」，1 卷。
103	1824 前	寒山子詩 集	1 卷，海幢寺重 梓 (240)	僧	經坊重梓	
104	1824 前	天然和尚 梅花詩	1 卷，清刻本 (241)		板藏	

編號	成書／ 刻書／ 序跋時間	文獻名稱	卷數、刊刻年 份、資料出處	捐資模式	海幢寺梓 刻／板藏	備註
105	1824 或 以後	戒殺放生 文	1 篇，清刻本， 勸善堂刊 (Leeds)		板藏	
106	1826	金剛正法 眼	1 卷，六年相種 跋，陳廷本書， 「曉山王君」重 梓，合璧齋重刊 順治二年道獨序 刊本（巴圖）	俗	板藏	
107	1826	華嚴寶鏡	1 卷，六年重刻 順治十三年道獨 序、今種跋刊本， 相種題識，通賢 與梁妙德捐資， 合璧齋刻（法圖）	僧俗	板藏	
108	1828	慧海小草	1 卷，八年刊本， 洪應晃序，相叶 識語，區昌豪跋 （《大典》）	僧	板藏	
109	1829	高上玉皇 本行集經	3 卷，九年李孝 光托相柱請工鐫 刻（巴圖）	俗	板藏	
110	1834	佛說安宅 神咒經	1 卷，十四年胥 清涯刊本（法圖）	俗	板藏	
111	1835	佛說天中 北斗古佛 消災延壽 妙經	1 卷，十五年相 松捐資刊本（法 圖）	僧	板藏	
112	1835	佛說高王 觀世音經 （白衣大 悲五印心 陀羅尼）	1 卷，十五年僧 承遠（默傑）重 刊雍正五年王士 俊書後本，彭尚 志緒寫（法圖）	僧	板藏	

編號	成書／ 刻書／ 序跋時間	文獻名稱	卷數、刊刻年 份、資料出處	捐資模式	海幢寺梓 刻／板藏	備註
113	1840	大佛頂如 來密因修 證了義諸 菩薩萬行 首楞嚴經 集註	10 卷，二十年 重鑄雍正十二年 傳晟序刊本，僧 通界及崔門馮氏 等捐資刊行 （《大典》）	僧 （尼？） 俗	板藏	未能確定捐 資者助刻原 刊本抑或重 鑄本
114	1842	妙法蓮華 經	1 卷，二十二年 修補乾隆二十九 年刻本（RJ）	僧		僧仁機捐 6 兩
115	1842	佛說大阿 彌陀經	2 卷，二十二年 修補本，海幢寺 補刻本（省圖）	僧	經坊補刻	僧能止捐 3 兩
116	1842	大方廣佛 華嚴經	80 卷，二十二年 補刻乾隆三十四 年刻本（據光緒 六年刊本）	俗		伍光裕堂信 女魯氏捐 10 兩
117	1842	阿字無禪 師光宣臺 集	25 卷，二十二 年修補嘉慶二十四 年刻本（《大 典》）	僧		彌陀閣常住 捐 5 兩而永 勝寺常住捐 4 兩
118	1844	（日宮天 子）太陽 尊經	1 卷，二十四年 刊本，伍門盧氏 偕男長樾捐資敬 刻（牛津大學）	俗	板藏	
119	1847	片雲行草	1 卷，二十七年 廣文堂刻（《大 典》）	僧？	板藏	
120	1847	沙門日用 錄	1 卷，二十七年 相匯、相柱、應 基刊，廣州海幢 寺（重）梓	僧	經坊重梓	

編號	成書／ 刻書／ 序跋時間	文獻名稱	卷數、刊刻年 份、資料出處	捐資模式	海幢寺梓 刻／板藏	備註
121	1820-57	長慶語錄	2 卷，今釋重編， 道光間海幢寺重 刻本（《彙編》）	僧	海幢寺梓	華首台、海 雲、海幢及 大佛四寺常 住及僧眾募 得 10 大 員 231 員及 30 兩。
122	1820-57	千山詩集	20 卷，道光間海 幢寺重刻本（《何 氏至樂樓書》）	僧	海幢寺梓	同上
123	1820-57	瞎堂詩集	20 卷，道光間海 幢寺重刻初印本 （點校《瞎堂詩 集》〈前言〉）	僧	海幢寺梓	同上
124	1820-57	瞎堂詩集	20 卷，道光間海 幢寺重刻重印本 （同上）	僧	海幢寺梓	捐資名單與 初印本略異
同治						
125	1862	百丈叢林 清規證義 記	9 卷，元年重鐫， 穎勤序及募各山 常住、禪侶捐資， 曠閒跋，顏薰校 閱（省圖）	僧	板藏	22 常住及 13 寺庵道場共 84 僧 募 得 256 兩 5 錢 8 分，刻板 並刷印紙料 費 218 兩 3 錢 2 分，餘 38 兩 3 錢。
126	1870	金剛經註 解	4 卷，九年海幢 寺刻本（湖南圖 書館藏，據普查 庫）	僧	經坊梓 刻？	
127	1838-75	慈悲道場 懺法	10 卷，海幢寺刻 本（中山大學圖 書館）	僧	海幢寺梓	寺僧 30 人 募得 77 員

編號	成書／ 刻書／ 序跋時間	文獻名稱	卷數、刊刻年 份、資料出處	捐資模式	海幢寺梓 刻／板藏	備註
光緒						
128	1880	大方廣佛 華嚴經	80 卷，六年穎 勤捐資刻道光二 十二年補刻乾隆 三十四年刻本 (RJ)	僧		
129	1880	大學綱目 決疑章	1 卷（附《中庸 直指》1 卷），六 年穎勤修刻（香 港大學圖書館）	僧	板藏	
130	1880	瑜伽集要 施食儀軌	1 卷，六年穎勤 修刻本（省圖）	僧	板藏	
131	1880	禪門日誦	1 卷，六年穎勤 捐資修刻本（東 京大學）	僧		
132	1880	指月錄	32 卷，六年海幢 寺重修乾隆十年 刻本（徐州市圖 書館藏，據普查 庫）	僧	經坊重 梓？	
133	1880-81	折疑論集 注	六年臘月海幢寺 重刻，僧智海敘 《番禺海南小志》 卷 9)	僧	經坊重 梓？	
134	1881	大佛頂如 來密因修 證了義諸 菩薩萬行 首楞嚴經	10 卷，七年穎勤 捐資修刻本（省 圖）	僧		
135	1882	觀楞伽阿 跋多羅寶 經記	4 卷，八年穎勤 捐資修刻本（香 港中文大學圖書 館）	僧		

編號	成書／ 刻書／ 序跋時間	文獻名稱	卷數、刊刻年 份、資料出處	捐資模式	海幢寺梓 刻／板藏	備註
136	1882	慈悲十王 妙懺法	存卷下，八年重 刻本，版藏海幢 寺（櫻井：103）		板藏	
137	1883	水纖（懺）	木板 1 冊，九年 穎勤修刻道光二 十三年刻本（櫻 井：107）	僧		
138	1884	寸心草堂 文鈔	1 卷，四年許其 光序刻本，十年 海幢住持及穎勤 等題識語（《彙 編》）	俗	板藏	
139	1890	寸心草堂 詩鈔	2 卷（集外詩 2 卷），十六年刻 本（《彙編》）	俗	板藏	
140	1893	蓮西詩存	2 卷，十九年壁 立序刻本，黃映 奎、潘飛聲題詞 （《大典》）	僧		
141	1898	綠筠堂詩 草	1 卷，二十四年 鐫，潤經堂印 （《大典》）	僧	板藏	
民國						
142	1911	尖峰山大 師幻遊集	2 卷，民國元年 海幢寺經坊本 （大西：84）	僧	經坊梓刻	
143	1919	楞嚴經	10 卷，民國八 年海幢寺刊本 （省圖）	僧	海幢寺梓	

Bridging the Pure Land and the Human World: The Publishing Priests, Printing Enterprise, and Social Networks of the Canton Temple Haichuang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Yeung Man Shun^{*}

Abstract

From the mid-18th to the late 19th centuries, Haichuang 海幢 Buddhist Temple was not only familiar to the local people of Canton (Guangzhou) and the neighbouring regions, but also better known to Westerners than any other similar establishments in China. In addition to its historic legacy and status as a tourist spot, a venue for cultural and diplomatic activities, the temple also published Buddhist texts, and was hence a convenient point both for Chinese to worship Buddha and for foreigners to learn about Chinese Buddhism. For such an important Buddhist temple, however, the history of its middle phase, especially from the mid-18th century onwards, is only faintly discernible. To reconstruct the largely unknown history of the temple, the first major task is to sort out the extant Haichuang texts, which provide invaluable information on inhabitants of the temple who participated in its publishing enterprise as well as their views on Buddhist philosophy and the temple's history. Founded on the author's on-site investigation into the texts, this paper is divided into seven parts: the first two sections state the author's new conception regarding of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history of Haichuang Temple and provides an overview of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value of the Haichuang texts. From Section 3 onward, making use of the Haichuang texts in conjunction with other firsthand Chinese and Western sources, the paper investigates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emple's publishing priests,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ublishing

* Yeung Man Shun, Assistant Professor, School of Chinese,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enterprise and the censorship campaign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and explains how sponsors from different backgrounds participated in the enterprise of publishing and circulating Buddhist texts. Section 6 discusses the roles played by the Haichuang texts and the priests in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The concluding remarks reassert the immense significance of the study of Haichuang Temple's history for an understanding of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the Qing era, of Buddhism in Guangdong, and of the history of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Keywords: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Guangdong Buddhism, Haichuang texts, publishing priests, prohibited books

